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新华文化



2024年·第3期·总期: 169 + S\$5.00



弃理从文 任君另闯一片天

- ◆ 流连于纯粹与理智之美的边界——新加坡极简现代主义画家、艺术策展人蔡荣恩
- ◆ 华乐鬼才林明钊 ◆ 梦圆于舞台的王秀菊
- ◆ 蔡志礼：从时代语境多模态演化 测新加坡华族文化风向

新嘉坡風土記 校釋

《新嘉坡风土记》作者李钟珏（1853-1927年），上海人。1887年李钟珏到新加坡拜访其谱兄，时任清朝驻新加坡首任专业外交官左秉隆，两人相见甚欢。旅居新加坡的两个月期间，李钟珏将其所见所闻写成《新嘉坡风土记》一书，约7200字，书中对新加坡的历史、地理、华人生活习俗和经贸等有细致描述，尤其如实地反映当时华人社会及殖民地政府剥削和压迫华侨的情况，是研究19世纪末新加坡华人社会最有价值的文献。原书于1895年由长沙使院出版，1947年再版。此次我们重刊《新嘉坡风土记校释》，又补充了不少资料，除有白话文本及英文译本外，还附有历史图片，今昔对照，增加阅读的兴趣。

预购须知

(1) 价钱（含GST）

原价：平装版S\$50 精装版S\$65

预订价：平装版S\$32 精装版S\$42

(2) 请在订书单上填写必要的信息。付款可以通过支票或PayNow方式。

若使用支票支付，请在支票上注明收款人为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并在支票背面注明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同时标明《新加坡风土记校释》。

支票连同订单单的复印版本邮寄至以下地址：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若选择 PayNow，请通过 UEN: S85SS0109H001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付款，并将完成的订书单复印版本，连同PayNow付款截图一起发送至 events@sfcca.sg 邮箱。

(3) 宗乡总会秘书收到支票后将电邮通知确认，并通知预购者领取。

其他详情，请于办公时间联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秘书处

电话：6643 6479 传真：6354 4095 电邮：events@sfcca.sg



《新加坡風土記校釋》訂書單

姓名：(中) _____ (英) _____

电话： _____ 电邮： _____

订书款式：平装 / 精装 (请相应地用圆圈标出)

订书数量： _____ 本 (在2024年底之前购买将享受优惠价)

日期： _____



编辑语

文·谭瑞荣

他的弃理从文、他的义无反顾、他的敬业乐业，除了兴趣爱好，更多的则是一种责任与信念在推着他一步步前行。这种责任与信念就是传承华族文化并使其在本地得到发展。——“文坛掠影”对林任君的如实书写。

“老外教汉语”，“语”和“文”应分轨处理；“老外教汉语”，应与以中国为导向的教育经验有所不同；“老外教汉语”，教材应本土化、语别化、国别化、族别化。这位“老外”就是吴英成，长相跟中国人一样，但他是新加坡人，是如假包换的“老外”。——“华语华文”对吴英成的排比修辞。

今天有幸能和学生一起继续圆梦在舞台上，并通过戏剧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弘扬华族语言和文化，我觉得是一件很美的事。所以，我认为我的人生是丰富且有意义的。——“戏如人生”对王秀菊的惬意访谈。

作为在新加坡有近两百年历史、民众所熟悉与喜爱的文化艺术形式，依然有深刻认识其价值的当代群体，尽心力以不同方式守护、传承与传播。这种现象，可视为当前华社对文化传承意识的逐渐加强。——“狮城艺事”对戏曲现状的乐观分析。

您有没有发现：以上的文章摘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华族文化的热爱！

虽经官方与民间不断努力抢救，但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华语文水平始终提不上来的困境，令关心华族语言文化盛衰的人士坐困愁城，忧心忡忡。过去随着华语文水平和使用率的下滑，华族文化在岛国式微成了无可幸免的下场，恶性循环的结果加上西风的吹袭和日韩雨水的浇淋，华族语言文化在新加坡的颓势，任谁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新华文化”里的一段悲观论述。

面对“华族文化”，一边厢是义无反顾的拥抱；另一边厢是坐困愁城的忧思。在当今的新加坡，作为“新加坡华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文华语，有未来吗？“新华文化”又将何去何从？

从166期起，《源》杂志就推出了“新华文化”专题，特邀本地的专家学者，对“何为新加坡华族文化？如何建构新加坡华族文化？”进行讨论。如果“新华文化”对您来说，还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如果您关心“新华文化”的前途和命运，那就从现在开始，敬请关注《源》杂志吧！

2024年·第3期·总期：169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编辑顾问■

吴绍均 方百成

■编辑委员会■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陈嘉琳 陈煜
叶舒瑜 王书雅

■总编辑■

谭瑞荣

■副主编■

欧雅丽

■英文校对■

何秀菱

■总代理兼发行■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设计、分色、承印■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会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出版准证■

ISSN 2382-5898
MCI (P) 034/02/2024

■出版■

2024年6月

目录

- p 4 炊烟岁月 酸仔里的情愫 尤今
- p 7 师恩难忘 治学严谨的戴玄之恩师 符懋濂
—— 南大回忆录
- p 10 文坛掠影 弃理从文 任君另闯一片天 齐亚蓉
- p 14 余音缭绕 华乐鬼才林明钊 郭永秀
- p 18 戏如人生 梦圆于舞台的王秀菊 章秋燕
- p 22 艺术长廊 流连于纯粹与理智之美的边界 赵宏
—— 新加坡极简现代主义画家、艺术策展人蔡荣恩
- p 27 狮城艺事 从连台好戏看兴趣圈内的新活力 蔡曙鹏
- p 32 吾乡吾厝 星洲海峡华人传承 陈煜
—— 同安白礁王沧周家族

知恩于行 感恩于行





p.14 余音缭绕



p.18 戏如人生



p.43 新华文化

- p 36** 南洋纵横 南洋旧时光里的两“书”一“会” 章良我
——《南洋年鉴》《星洲十年》和“南洋学会”
- p 38** 旧貌新颜 加基武吉：旷野鸣沙 城水交融的山脚风情 李国樑
- p 43** 新华文化 从时代语境多模态演化 测新加坡华族文化风向 蔡志礼
- p 48** 华语华文 活跃在中文国际教育舞台的新加坡学者吴英成 汪惠迪
- p 52** 最爱书房 落地生根的郁金香 庄永康
—— 孙宽双语诗集意象
- p 54** 学海拾珠 旧时代广帮总坟墓碑上的“寿”字纹饰 庾淮诚
- p 56** 总会专递 知恩于心 感恩于行 欧雅丽
—— 宗乡总会与中华总商会联办“向李显龙资政致敬”千人宴
- p 58** 百年古籍再现新加坡早期历史 欧雅丽
——《新嘉坡风土记校释》出版
- p 60** 仿佛风 你认错人了 黄楷婷
- p 61** 屏 于锐霖
- p 62** 本土文学 爱上七里香 齐亚蓉



酸仔里的情愫



文·尤今

傍晚，弟弟拨电给我，声音被兴奋煮沸了，滚烫滚烫的：

“姐啊，你猜猜，昨天我看到了什么？”

这没头没脑的问题把我问懵了，我还没开口，弟弟便紧接着说道：

“我看到了三敛树（Bilimbi）耶！”

“三敛树！”我的心立刻长出了翅膀，一叠声地问道：“哪里？在哪里？你在哪里发现三敛树？”在这一秒，我的声音也被亢奋煮沸了。

“就在荷兰村附近的组屋区，有不止一棵哪，树上结实累累呢！”

“你有采一些酸仔回去烹煮吗？”我意兴勃勃地问道。

“你明天带个篮子去，采了，分一点给通风报信的人啦！”狡黠的弟弟笑嘻嘻地应道。

次日一早，我便像一只鸟儿一样，扑棱着翅膀，迫不及待地飞往荷兰村。就在距离荷兰村不远的Holland Close组屋区，我果然看到了朝思暮想的三敛树（Bilimbi Tree）。

树高五六米，对称工整的叶子循规蹈矩，排列有序。仰头一看，哎哟，心如小鹿乱撞，惊喜不迭！一串串小巧玲珑而又晶莹剔透的酸仔，像是绿色的翡翠，风情万种地悬挂于枝桠间；有些肥硕的酸仔，突兀地长在赤裸裸的树干上，好像是不受管束地从家里逃出来的顽童，正居高临下万般好奇地俯瞰人间百态。

童年有关酸仔的记忆，被岁月风干了，一直储存在记忆的深处；眼前的三敛树，犹如一盆清水，将那份干缩的记忆泡涨开来；那一颗一颗复活了的酸仔，遂在我脑子里拼凑成一张完整的图片……我站在树下，心情激动，喃喃地说：“酸

仔啊酸仔，久违了呵！”

童年在怡保，曾有一个时期，我们住在甘榜的一所木屋里。左邻住了一户非常和气的马来人。莱蒂法阿姨早婚，才30来岁，便生养了五个孩子。尽管屋子里里外外都有着尘埃般看不见又做不完的家务，可是，莱蒂法阿姨还是保持着超好的脾气，她有点暴牙，不笑也似在笑，一天到晚都好像喜气洋洋的样子。

我们手足三人都不谙马来话，莱蒂法阿姨的孩子们也不通粤语（怡保的华裔多以粤语沟通），鸡和鸭，对不上话，游戏便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六岁的阿依莎与我同龄，我们常常玩跳房子、踢毽子、跳绳、抓抛五石子、摇呼啦圈；男孩子们呢，弹玻璃球、掰手腕、踢足球、捉迷藏、偶尔也打架。在每天的接触中，我们姐弟们都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马来话，对方也会讲一点广东话。一大清早见面时，我会说：“Selamat Pagi”，阿依莎则以粤语回应我：“早安！”生活的浸濡是学习语言的不二法门，诚然！我现在还会讲十来句蹩脚的马来话，就是童年残留的记忆。

记得有个早上，柔软的阳光像雪糕一样冰凉，我看到莱蒂法阿姨右手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左手拿着一个塑料袋子，往甘榜后方的小丛林走去，阿依莎跟在后面。我站在自家门口愣愣地看着她们，不知道她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阿依莎转头问我：“你要来吗？”母亲首肯后，好奇的我，便一蹦一跳地跟在她们后面，进入了小小的丛林。只见莱蒂法阿姨站在一棵不很高的大树旁，仰头看了一会儿，便举起了手中的竹竿，一下一下地将树上青翠的小果子打下来。果子如雨般降落，阿依莎蹲在地上，轻车熟路地把果子捡起来，放进塑料袋子内，不旋踵，便装满了一袋。馋嘴的我，径自拿了一枚放入嘴里咬着吃，一入口，哎哟！那股夺命的酸味像旋风般直冲脑门，我龇牙咧嘴，惨叫连连，几乎连眼泪也飙出来了。平生第一回与酸仔的邂逅，竟是如此不堪、如斯狼狈！“哈哈、哈哈！”当时莱蒂法阿姨那惊天动地的笑声，把鸟儿都惊飞了。稚龄的我，并不知道，酸仔其实只能用来烹饪，不可以生吃。

当天傍晚，莱蒂法阿姨家中飘出了一缕一缕的香气，那香气，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向四处游移，化成了一个个钩子，勾出了我们肠胃一串串不顾廉耻的叫声，连妈妈也不由得频频缩鼻赞叹：“好香啊！”

过了不久，莱蒂法阿姨上门了，手中捧着一碗东西，告诉母亲，那是“Ikan Bilis”和“Belimbing Buluh”一起煮成的食物。聪慧的母亲凭自学说得一口流畅的家常马来话，她知道Ikan Bilis是“江鱼仔”，但是，在她贫乏的字典里，并没有“Belimbing Buluh”这个词汇。后来，查了字典，才知道这是一种叫做“三敛”的野果，学名是“Averrhoa Bilimbi”，俗名称为酸仔。三敛树是马来甘榜常见的植物，马来人嗜食酸仔，常爱用以烹饪。

莱蒂法阿姨这道菜肴，真是一绝啊！炸得酥酥脆脆的江鱼仔，掺杂了大葱的甜味、小辣椒的辣味和酸仔的酸味，滋味是立体的、丰富的、多元的，极好下饭。我们吃得满嘴嘎嘣乱响，但觉这就是贫穷里的奢侈、平淡里的幸福。成长以后回想，以江鱼仔配搭酸仔，实际上是一道充满了智慧的菜肴：价格低廉的江鱼仔营养价值高，富含钙质和蛋白质，能强健骨骼和牙齿，被看成是江河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而野生的酸仔呢，不费分文便予取予求，它蕴含有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能补充营养，提高抗疫能力，还能健胃消食，促进消化，有人逗趣地把它誉为果子中的“大熊猫”。让这两者共结连理，着实是天作之合啊！

知道我们喜欢酸仔的味道，莱蒂法阿姨每回采摘了新鲜的酸仔，便分一些给我们；而母亲呢，知道莱蒂法阿姨喜欢甜品，每回煮了红豆沙、绿豆沙、番薯糖水、鸡蛋腐竹糖水、白果薏米糖水等等，都会送一点过去给她。食物，往往是甘榜村民的“外交大使”，在袅袅的香气里，一来二往的，陌生变稔熟，感情逐渐升温，继而祸患与共，守望相助。

在甘榜住了一年多之后，我们便迁往他处了。莱蒂法阿姨、阿依莎、三敛树、酸仔，也慢慢、慢慢地淹没在潺潺的岁月长河里了。

我八岁那年，父亲带着全家人南迁到新加坡。我们经历了一番风雨飘摇的日子，等生活稳定而渐入佳境之后，母亲又重新拾掇了烹饪的乐趣。

有一天，她从竹脚巴刹回来，脸上浮现着像丝绸一样软软的笑。她把我们都唤到跟前，取出以旧报纸裹着的一包东西，打开来，躺在里面的，是一颗颗玲珑的、丰满的、翠绿如玉的果子。我们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酸仔，酸仔！”欢喜的笑意从我们的眉眼汨汨地向外流淌，心里涌起了一股恍惚的温馨。有些记忆，像高高翻起的浪头，掀过了，便没了。然而，有些记忆，却像海床里的沙砾，它沉淀在海底，看不见，但是，它在，一直都在，永远不会消失——偶尔遇上了蚌，沙砾还会转化为珍珠哪！生活于甘榜的那一段记忆，在这一刻，便在我们眼前闪烁着像珍珠一样的亮泽。

当天中午，母亲便切了酸仔、大葱、辣椒，炸了江鱼仔，煮了那一道酸酸甜甜咸咸辣辣的菜肴让我们重温旧梦了。

与酸仔重逢于新加坡后，它便三不五时地出现在餐桌上了。

母亲在烹饪上喜欢求新、求变，她试着用酸仔去煮素菜咖喱，可我觉得酸仔那清爽而又活泼的滋味被咖喱辛辣而又深沉的浓味掩盖了，只能藏头缩尾地泄露出一些猥琐的酸味，因而不太喜欢。母亲也曾试用酸仔来炒虾仁，可是，相对而言显得强势的酸仔，却嚣张地将虾仁的鲜味谋杀了。由此可见，食物的配搭也像姻缘一样——八字吻合，则花好月圆、缠绵缱绻；八字不合，则貌合神离，乌烟瘴气。

母亲不为失败所挫，屡败屡战。有一回，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让酸仔与猪肉琴瑟和鸣。她把嫩滑的里脊肉切成薄片，把酸仔切成颗粒状，加入蒜泥、豆酱、糖和些许绍兴酒，慢慢焖煮，煮好之后，依父亲的建议，撒上金光灿烂的猪油渣。哇哇哇，那真是勾魂摄魄的味道啊，深邃而又缤纷。味道浓稠的豆酱，像是喧闹的锣鼓声；而酸仔呢，宛若一串串清脆的风铃，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当叮叮当当的风

铃声浮现在“咚咚咚咚”的锣鼓声里时，流光泻玉，在舌尖上绽放火树银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味觉体验。

这是母亲独创的菜肴，她很感自豪。家人狼吞虎咽的样子，让她自鸣得意。她常常煮，而我们呢，也总是百吃不厌。每每掌灯时分回返家门而闻到它气势磅礴的香气时，原本粘附在心中的烦恼和阴霾，便像水蛭遇着盐一般，松脱了、掉落了。风卷残云地吃，不知人间何世。吃毕，么弟突然脱口而出：“妈妈，这真是神仙肉啊！”大家捧腹大笑，从此，这道菜肴便有了一个尊贵的名字：“神仙肉”。

这样幸福的日子，过了好多好多年。

2003年，母亲撒手尘寰。

常常有人说，怀念母亲最好的方式是烹煮一道她拿手的菜肴，当香气蓬蓬勃勃地弥漫于厨房时，主炊的人当会感觉到母亲温暖的爱如云似雾层层叠叠地飘浮在四周；在这一刻，母亲就近在身旁，活着。

最近，手足聚餐，谈起母亲的烹饪手艺，大家不约而同地提起了经典的“神仙肉”。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姐弟都对烹煮方法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尽情享受树荫的清凉而没有去学习植树的技术。惆怅、遗憾与悔恨，化成了心上的一个大窟窿，空空荡荡的，想要填补，却又不知道如何去填补，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去填补。

此刻，我站在荷兰村组屋区的三敛树下，看着那一串串丰满的酸仔，我多么、多么想摘一袋回家去，尝试去煮那一道让我朝思暮想的“神仙肉”啊！可是，在新加坡，擅自采摘花卉和野生果子，罚款高达5000元哪！我岂敢以身试法！

有人告诉我，在马来族常爱去的芽笼士乃湿巴刹，肯定可以找到卖酸仔的摊贩。

我已决定，买到酸仔之后，立马便为我挚爱的手足和我亲爱的孩子烹煮那道“神仙肉”。

也许，我煮不出母亲那种让人魂牵梦萦的好味道，但是，我肯定，里面有爱的滋味。

神仙肉，是爱的缅怀，也是爱的传承。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治学严谨的 戴玄之恩师 南大回忆录



文图 · 符懋谦

记

得在1972年，南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不久，我很幸运获免考试，成为了它最早期研究生之一，攻读历史硕士课程。按照规定，这是四年部分时间的课程。

当时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是戴玄之教授，他很乐意收我为入门弟子，指导我进行学术研究与撰写硕士论文，只要我的研究是明清史的方向。我知道恩师的学术根底深厚，对于义和团、白莲教、红枪会、天地会都有深入的研究，所以避开了这四大领域，决定以捻作为研究对象。恰好当时南大历史系有一套《捻军资料丛刊》共六巨册（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内容相当丰富，可以作为基本的参考资料。其中包含清代名人之专著、文集、书翰，以及安徽、河南、湖北、江苏、陕西、山西、直隶、山东等八省方志（县志）中的相关信息。

得知我选定的研究对象后，恩师深表赞同，因为关于捻的研究，在当时并不多见，属于相对冷门的课题，只是觉得资料来源还不足够、不完整。涉及论文题目拟定，就颇费周章，即使属于暂定性质，完成论文后还可以更改，但恩师依然要求题目固定下来，这样研究时才有明确的方向。我原本想到的题目是《捻军的起源、演变及

其战略战术》，但恩师认为有些不妥，因为学术研究不能先入为主，还没有深入研究就断定它是军事组织。结果在恩师细心指导下，论文题目就定为《捻之本

质及其战法》。我个人比较喜欢带有争议性的课题，对于这中性题目我很满意，它仍然赋予我探索、发挥的广大空间。由此可见，恩师治学极为严谨，对学生拟定论文题目，要求非常认真、严格。

论文有了题目，就等于学术研究有了明确方向与范畴，但还须列出章节，才算完成整个课题的学术构建。不过恩师认为，在初始阶段，只要列出几章来即可，每章小节可以容后决定，即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构建。恩师的想法与我完全一致，经过反复思考、讨论，该论文终于构建了四章：第一章是捻之起源及其组织；第二章是捻之性质；第三章是捻之战法；第四章是清政府之



戴玄之教授
(1987年11月27日
摄于香港)

剿捻策略。每章需要两节到三节来完成，并且一面审视、吸纳他人的研究成果，一面设法另觅蹊径，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尽量做到“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章学诚语）。这其实也是恩师的基本要求，因为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在学术研究上毫无意义，绝不可取！它无疑对我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挑战。

关于捻之起源：我综合各家之记载与说法，提出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三四省交会处，即俗称“三不管”、“四不管”地带，应该才是捻之发源地，首先获得恩师的肯定、赞赏。至于捻之组织，从内部基本组织到圩寨、旗帜、兵种、武器等，恩师同样要求我必须言之有据。在这章里，我根据原始资料进行研究，发现邓嗣禹误读资料，把“二捻头”解读为捻首中的老二。而实际上，是指捻有二位首领，一位叫“掌捻”，一位叫“领捻”。1961年出版的《捻军及其游击战》（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rilla Warfare）是邓氏的博士论文，但它犯了明显的错误，因为原始资料才是最高权威，拥有最后发言权——这是恩师经常强调的治学原则。

论及捻的性质，学者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它是杀人不眨眼的武装匪徒；另一派则认为它是反清政府的革命组织。孰是孰非？我觉得

这不是“非黑即白”的议题，最终还得让各种史料说话。阅读了大量一手史料，我发现捻既不是一般匪徒，也不是什么革命武装力量。首先，我必须用一节来论证“捻匪非匪”，包括诸多官方记载自相矛盾，以及湘军剿捻将领刘铭传诗作《郊行》，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兵不如匪”的史实。然后再用另一节论证“捻非革命说”，包括“革命”一词的定义，必须涵盖“破旧”与“立新”两领域，但捻并不以建立新政权为其初衷、使命。官方文书一再提及捻“本无大志”，与太平天国迥然而异。唯独在晚期有部分捻成为所谓“太平新军”，它才比较接近于太平革命，但已属强弩之末，不久即告覆亡。因此，我给捻的历史定位是官逼民反的自发性生存斗争或农民战争。恩师同样表示支持、赞赏，给予我莫大激励、鼓舞，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毕竟是个充满争议的历史课题！

接下来的两章，除了原始资料，还有前人研究成果可供参考，但仍然必须“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我论述中的最大特点，就是按照恩师的明确指示，把捻之战法分为战略与战术两部分加以论述。其他人的论述包括罗尔纲、江地、邓嗣禹、蒋湘泽等人的专著，似乎都没有做到这点，都将战略与战术混为一谈。



戴玄之教授第二张全家福，也是最后一张全家福照片（1976年7月摄于新加坡）



政治大学历史系同仁出游。戴玄之教授及夫人（右二及右三）与林能士教授及夫人（左一及左二）等人1985年6月摄于屏东县垦丁公园

众所周知，以史为鉴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所以求真存实必不可少，极其重要。记得恩师对史学研究不断强调两点：一是要充分掌握原始资料，即使是添砖加瓦，也要尊重史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空口说白话”绝对不允许、不接受。在研究过程中，为了前者，我除了细心阅读《捻军资料丛刊》等十几种原始资料，并用卡片记录有关信息；还翻阅了各家著作关于捻的论述，包括清史（如萧一山）与近代史专家的相关论述。各种参考文献总共将近六十种，就五六万言的硕士论文而言，应该是非常足够的吧？为了后者，我采用大量注释，数量多达三百多个（次），完全落实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看来恩师对此相当满意。我与恩师的看法有时相左，但他始终很尊重我的看法，仅需我“拿出证据”来——“孤文单证不足为凭”。日后我指导学生撰写学位论文，也遵照相似原则，主见与创见缺一不可，就是受到恩师学者风范的熏陶。

恩师规定每写完一节或一章，就把手稿呈上给他审阅。文章内容的适当性、正确性固然是恩师所特别注重的，孤文单证不足为凭，务必给予补充；而遣词用字乃至标点符号的使用，恩师也从不轻易“放过”，都细心审查一番。二者均

让我受惠匪浅，其认真程度怎不令人敬佩、值得效仿？

恩师治学极其严谨，不仅体现于其对学生的指导要求上，同时也体现于其著作如《义和团研究》《白莲教的本质》上。俗语说“真金不怕熔炉火”，恩师在学术上的成就，最终也受到大陆学界的高度重视与赞赏。其大作《义和团研究》《明清帮会教门》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2010年、2019年出版，不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的四年硕士课程，除了撰写论文，还必须上三门课，其中一门就是恩师的《明清帮会组织》（这科目名称未能肯定）。当时，我和龙鹏飞先生都在教育部任职，他是中学校长，我是国家初级学院教师，所以上课只能安排在晚间。每周一次，我们驾车到恩师的住家上课。那是坐落在南洋大学云南园的山岗洋房，是校方免费提供给系主任的。我们俩都很守时，大约在晚上七点开始上课。恩师是研究白莲教与义和团的专家学者，讲述二者如数家珍，我们却忙于做笔记。恩师说话的河南口音很重，我听完全没有困难，但龙先生经常听不明白，不得不打断恩师的话语，然后由我来“翻译”一遍。对此，我们只好哈哈大笑，恩师当然也不例外。非常有趣吧？这事在

当时的南大，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因为南大教授都来自五湖四海。其实，恩师温文尔雅，说话总是轻声细语，满脸微笑，客气异常，是我们名副其实的“亦师亦友”。师母让我们更“不好意思”，每次上课之后，她总备些甜品或水果给我们享用，有时还和我们话家常呢。

那段进修时光是多么美好！可惜好景不常在，1980年“南洋大学”竟然变成了历史名词，恩师也已提前回到台湾去，我们都成了断肠人在天涯！

（作者为资深教育工作者）



戴玄之教授及夫人（右三及右四）与珠海书院研究生及同仁1988年5月摄于香港

奔理从文 任君另闯一片天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父辈故事

上世纪30年代中期，20出头的林汉森在婚后不久即离开祖居地广东潮安，前往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讨生活。九岁失怙的他曾读过几年私塾，除了一身的力气，几乎所有的杂务他都能应付自如。在马来亚当了几年店员之后，他南下新加坡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挨过日治时期（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他已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们一家大小在芽笼416号（今阿裕尼路跟芽笼24巷之间）一间租来的屋子里安居下来。

日本人投降后的第四个年头，汉森迎来了自己的第五个孩子——他给这个和平年代出世的第二个男儿取名任君，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的膝下又多了三个儿女。

挨过饥受过苦的汉森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奢求，他相信多子多福，更相信教育的重要。

“只要孩子们将来有出息就好。”他尽自己的所能让孩子们衣食无忧并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对他们的要求也颇严格，比如放学回家后不许他们到处乱跑，以免受到不良影响（当时有私会党在芽笼一带活动）。

他喜欢读报，家里订有《星洲日报》，孩子们自小也就养成了每天读报的好习惯。

如果给这位父辈的故事来张插图，报纸当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公教时光

任君有关人生的最早记忆，可追溯至他上幼稚园的时候。父母为他报读的卫理幼稚园靠近住家，在那里，他学会了算术，也认了不少华文字。回到家里，这名学龄前儿童除了在屋前的空地上跟邻家小伙伴玩玩打弹珠或球类游戏及在附近闲逛外，并没有其它的娱乐。

7岁那年（1956年），母亲听说公教是所好学校，便带他去参加入学考试。虽然未曾学过英文，但他因算术跟华文皆获满分而顺利进入这间中英文并重的名校，为期12年的公教时光由此开启。

位于坡底（今市政区）奎因街8号的公教小学离家很远，加之交通不便，读下午班的任君每天都得早早出门跟别人拼车，但这在他看来何尝不是一种乐趣。

而最为令他感到开心的，是小四那年遇到陈创守老师。

满目慈爱的陈老师担任他们的级主任兼教华文，他不但教学有方，且不辞劳苦带学生去郊

游，去参观课本上教过的名胜地。这种户外教育对甚少走出家门的任君而言，无异于为他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他的眼界骤然开阔起来。

小学毕业后，任君继续留在公教读中学。由于教室不足，直至中三那年，他跟同学们才“升上”马路对面（奎因街222号）的中学部。

此时的任君遇到了又一位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良师——班主任兼教《中华文选》的黄伟光老师。黄老师貌似威严实则和蔼可亲，讲起课来娓娓动听，深得学生们喜爱——其个人魅力跟《中华文选》的魅力相互交融，似一股清冽的甘泉，滋润着少年任君的心田。此时的任君虽然对理科更感兴趣，但华文课显然是他的最爱。每天，每天，他贪婪地吸取着养分——中华文化的精髓，古今中外的智慧。少年任君的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浅浅的，淡淡的。

与此同时，他也交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中四那年（1965年），他的同学陈圣端接受同座许嘉煜的提议，意欲接棒前一届学长龚万宝办了一期的文艺刊物《公教学生》，更名为《学文》，任君跟另一同学何人雄加入，成为发起人之一。这一年的2月15日，《学文》四人编辑组成立，后来，吴惠川、黄强、黄树信、王康美、刘启光、谢敬贤等六位同学相继加入，编委会成员增至10人。



《学文》编委会成员合照于1966年（前排右二为林任君）

升入高中后，数理成绩突出的任君被编入理科班，并成为所在班（高一B班）班长，那是1966年。

就在这一年的3月31日，筹备一年余的全校性文艺刊物《学文》创刊号出版。

《学文》创刊后，得到全校师生尤其张世典校长的大力支持，当年顺利出版四期。由于投稿不限年级，低两三届的同学如多年后在华文报刊写专栏的吴伟才、姚忠在及刚刚卸任总理的李显龙都有好文刊登。次年的“革新号”（第五期）出版后，首届编委功成身退，交棒下届学弟。直至今日，《学文》的香火依旧在公教学子的手中缭绕。

交棒《学文》后，这群才华横溢的少年又在当年（1967年）推出了他们的高二毕业刊，该毕业刊设计新颖，编排独特，成为后来历届公教学子尊崇的典范。

《学文》与毕业刊于任君个人而言，其意义则更加深远。

人生转折

高中毕业后，《学文》原班人马各奔东西，但大家并未失去联系。由于对办杂志意犹未尽，热情不减，当远赴澳洲攻读美术的曾德阶同学（《学文》及高中毕业刊设计者）倡议创办一份以大专学生和知识界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取名《猎户》）时，很快便得到大家的支持与响应。

1968年下旬，《猎户》进入筹备阶段，发起人曾德阶负责策划和设计，陈圣端担任主编，刘启光负责业务及广告，他们三人成为《猎户》的灵魂人物，其他编委大多由67届公教学子组成，林任君为编委之一。

任君高中毕业后被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录取，由于会考成绩优异，他获准直接进入大学二年级读理科。

令人意想不到的，这位理工男的心很快便被《猎户》俘获。这一时期，对任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就读南大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的陈圣端。

圣端是《猎户》的军师，也是大家的“精神导师”，他把学到的大量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及术语用于《猎户》，通过邀稿、采访、专访、座谈会、社会调查等方法部署题材、组织稿件，令任君大开眼界。

1969年6月，《猎户》创刊号问世。其大

胆前卫的封面设计及不拘一格的版面编排令人眼前一亮，但凡看到，谁人又能忍住不去翻阅？但凡翻阅，哪个又能忍住不去思考？就像此时的任君，反复翻阅不断思考的同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扇大门。推门而入，他发现了一个由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构成的“美丽新世界”，这个世界令他沉迷、沉醉，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不久之后，他做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那就是弃理从文。

次年，他离开新大，成为南洋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系一年级的一名“新生”。

进入南大的任君在兼顾学业的同时跟大家一起继续经营《猎户》，一年后第二期出版，再一年后第三期出版。自此，这份凝结着67届公教学子心血的刊物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步入历史，但文字与出版的星星之火已在任君的心中点燃。

投身报界

1973年，任君大学毕业，获荣誉学士学位的他在服过两年半兵役之后成为一家私企的行政人员。

1977年2月，他被《星洲日报》录用，任职国际新闻组翻译员，虽然薪水减去不少，但他脚下的步履轻快了很多。

1983年3月，《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同时也出版《联合晚报》），任君升职为《联合晚报》国际新闻组副主任。此后，他一步一个脚印，从《联合早报》国际新闻组主任（1984年8月）



林任君部分作品

到采访主任（1986年3月）到执行编辑（1988年7月）再到副总编辑（1992年4月）。1993年年底，他被委任为《联合早报》代总编辑，1995年1月，他任职总编辑。

从《学文》到《猎户》到《星洲日报》再到《联合早报》——他的弃理从文、他的义无反顾、他的敬业乐业，除了兴趣爱好，更多的则是一种责任与信念在推着他一步步前行。这种责任与信念就是传承华族文化并使其在本地得到发展。

掌管《联合早报》之后，他心中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正值壮年的他愈加勤勉，虽日理万机，但他事必躬亲，常常夜里两点多才离开报馆。

历经磨砺的任君不但更脚踏实地，他的眼界也更开阔且具前瞻性，可说是立足狮城，心怀天下。

在他的主持下，早报在1998年、2003年及2008年庆祝75、80及85周年报庆时，分别举办了三次堪称经典的跨界文化论坛，所邀主讲人皆为跨国文化大师。

此外，他还主持早报率先上网（兼任“早报网”主管），使其成为少数获准在中国发行印刷版及网络新闻的外国媒体。

除了全面主持报馆的日常工作，他的评论（有关时事及媒体）从未有过间断的时候。

2012年6月，他任职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业集团总编辑至2015年2月退休。

离开报馆

离开报馆的任君并未闲下来，他跟他的那群老哥们早就计划着重逐旧梦——编一份中四毕业50周年纪念刊，全称为“五十回首——公教中学一九六五中四毕业班五十周年纪念刊”。

这份刊物自筹划至2015年年底出版，《学文》原班人马全程参与。这一次的主编自然落在任君身上。但其实，除了主编，他还是主笔。加上序言及编后语，他的文章多达十篇，篇篇至真至情，功底之好令人叫绝。

2021年伊始，早报为他在言论版开了个专栏，取名“四面墙外”，每月一篇。首篇《二零年目睹之怪现状》刊于2月12日，那天适逢大年初一，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早报之前从未有过除夕及初一开工的先例）。

除了早报专栏，他也在《怡和世纪》发表文章，还给同事及朋友写序，但他无意写回忆录，更无意出书。

2022年，早报筹备百年庆之际，社长李慧玲决定为这位“老总”（前同事对他的昵称）出本书。来自“老东家”的好意他倒是乖乖接受了。《老总终于出书了》，是序文，也是慧玲及同仁发自心底的欢呼。

2023年6月，林任君选集《世事任君谈——报人生涯一得之愚》问世。700余页，绝对够分量。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后记

得知林任君之大名是他出书后的事，但直至2023年年底在何乃强医生的新书发布会上首次碰面（比邻而坐）之后不久，方知晓他曾位居早报高层。后知后觉很多时候并非坏事，不然那天上台分享时可能就不会那般收放自如了。

甲辰龙年春节前个把月，因故空出一个多星期时间，贸然发信息给他，想着若他借故推辞抑或时间不配合也就作罢。

两天后，准时前来接受采访的他留给我的时间仅仅一个多小时，笔谈世事言无不尽

的他，言谈间的轻描淡写无人能出其右，似乎岁月未曾给他留下任何印痕，亦或所有的印痕都已被轻轻抹去。这个早报曾经的掌门人，他的世界怎可能如此云淡风轻？这个曾经阅人无数的媒体工作者，他怎可能不知晓一个小人物的诚惶诚恐？唯一的解释是他内心的淡泊宁静——就让这位谦谦君子好好享受“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自得吧。有了《五十回首》里他真性情的一面，我的人物专访定当一如既往鲜活而生动。

感谢何乃强医生！



文图·郭永秀

华乐鬼才

林明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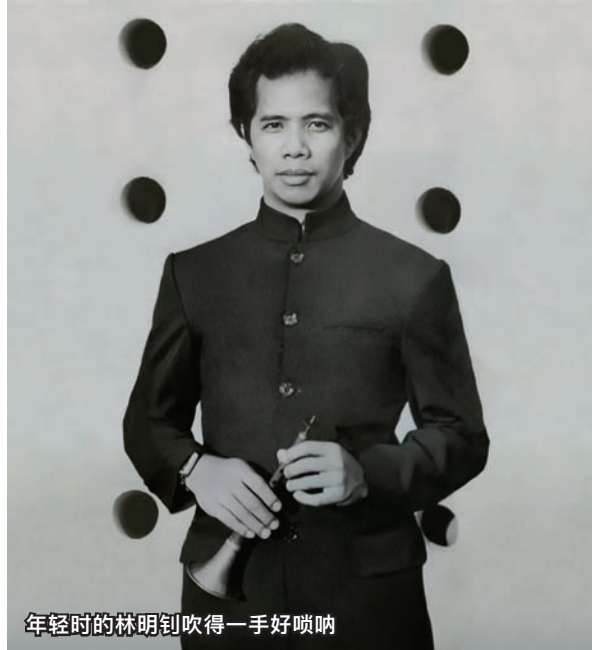
老 一辈从事华乐的工作者，一提起Mohammed (Ahmad)，大都知道他是谁。早年他曾经是教育部属下青年华乐团的团员，国民服役之后，参加后备军人协会华乐团，后来又进入新加坡人民协会华乐团当指导员。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在国家剧场创立乐团的时候，他并没有参加我指挥的乐团，可是我却经常从华乐界的朋友口中听到他的名字。起初还以为他是一位马来同胞，后来才知道他是地地道道的华人，只因为他的肤色倾向棕色，五官又酷似马来人，所以大家索性叫他Mohammed，他也不以为忤。其实，他

的本名叫做林明钊。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我就听过他的大名了。当时我在人民协会华乐团担任笛子手。乐团指挥马文老师离开乐团不久后，李雪岭曾经担任过短期的指挥，过后由吴大江接任，再接下去是林哲源。吴大江及林哲源都请林明钊担任乐团的指导员。我和明钊并不认识，听见每个人都叫他Mohammed，对他起了好奇心，后来发觉他什么乐器都行，特别是早年的华乐队里极缺乏唢呐手，而他也能吹唢呐。我的年纪比他小，音乐方面起步又比较晚，不免对他感到非常敬佩。但我们之间便没有什么交集。



在国外演出时摄。从左到右依次是：
陈世庆、林明钊、全运驹、苏贤卿、周亚发



年轻时的林明钊吹得一手好唢呐



年轻时的林明钊（右二）与青年华乐团的朋友合影



林明钊（第二排左二）在总统府演奏以后与当年的黄金辉总统伉俪合影

2018年9月，我正式从职场上退休，结束了40多年在工艺教育学院当讲师的日子。一些老朋友邀请我和他们一起组织乐团，继续从前未完成的梦想。回忆起30多年前分别在国家剧场俱乐部及信托局创立华乐团及中西混合乐团的日子，80年代中期国家剧场因为建筑上的缺陷而被拆除，当时我指挥的中西混合乐团被逼迁移到嘉龙剧场活动，90年代国家剧场信托局正式解散，并入新成立的国家艺术理事会以后，乐团也解散了。以为此生不会再搞乐团，却想不到这些老朋友仍然对以前的日子念念不忘，2018年4月，银河民族室内乐团就这样诞生了。

银河民族乐团创团者

乐团草创初期只有十多位团员，明钊也是创团团员之一。几十年后再见他时，发觉他与我印象中的那个Mohammed，其外形上有很大的改变。整个人看来很憔悴，白发苍苍，已没有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样子，但演奏乐器时那双眼睛仍然炯炯有神，散发出对音乐无休止的喜爱。

明钊能演奏多种乐器，团里缺什么乐器，他就去演奏，例如高胡、二胡、中胡、古筝、笛子、唢呐、打击乐器……他也帮忙教导和训练团里演奏技巧比较弱的团员，演出时他经常担任领奏和独奏。乐团初创时有些团员已经30多年没

有动过乐器了，大家演奏起来不免有些生疏，但明钊这几十年来却没有停止演奏，因为他是靠演奏音乐来维持生活的。在演奏技巧上，他都尽力以他的经验帮助指导其他的团员。

银河民族室内乐团从2020年起，进驻新加坡醉花林俱乐部，成为其属下的文娱单位之一。乐团也改名为醉花林银河民族乐团，团员从起初的10多人增加到目前60多人，增加了一些年轻的乐手，演奏水平突飞猛进，使许多停了30多年的“老团员”也恢复到他们年轻时的演奏水平。

银河民族乐团在醉花林的排练时间是每个星期六下午，这个时间也往往是明钊赚钱的最佳时刻。有好多次他宁愿放弃工作，来醉花林和我们这个没有薪酬、没有收入的乐团排练，由此可见他是一个讲义气、重情谊的人。

出入医院却不忘音乐

2022年，明钊突然请假，没有到乐团来排练，后来才知道他因病入院。明钊一生没有结婚，孤身一人。他有一名义子，但因工作经常轮班，有时两人也碰不到面。1月26日当明钊在送殡的中西乐队中演奏完毕，打算吃点东西要回家的时候，感觉小便不通，剧痛难耐，叫救护车紧急送入医院。经多次检验以后，医生说是大肠癌，影响了泌尿系统。后来动了手术，身体才慢慢恢复，但却不良于行，躺在病床上，经过物理治疗以后他才能行走，但行动缓慢。2023年身体稍微好一些时，他又回来醉花林银河民族乐团参加排练了。

2024年春节期间，明钊因为晚上起来喝水，突然晕倒，直到天亮时才苏醒入院。这期间出入医院多次，他都坚强地挺住了。我好几次到医院看他，他虽然只能躺在病床上，行动不便，但仍然带着乐观的态度，侃侃而谈，说身体恢复健康以后还要回去乐团排练。

明钊出生于音乐之家，其父为华乐界的老前辈，他自幼在父亲的熏陶下吹得一手好唢呐。明钊不但对民间音乐有深入的研究，也通晓武术，对舞狮技艺颇有心得。他曾是青年华乐团舞

狮队导师，曾代表新加坡武装部队文化团旅欧三个月，巡回表演。他加入青年华乐团的时间虽然短，但却是该团优秀的团员之一，他经常演奏的唢呐曲是《抬花轿》和《铁道兵》。

明钊曾经参加人民协会华乐团，在林哲源以及较后吴大江执掌乐团的年代，他帮忙指导一些团员；在青年华乐团时也曾跟团到英国表演；70年代中期在后备军人协会时，陈景文和杨秀伟等开始酝酿组织华乐团，聘请颜明春当指挥，后来换成了林哲源，明钊一直都在团里。

在酒楼饭店中演奏华乐

70年代到90年代，明钊也曾多在多间酒楼演奏华乐。开始的时候参加了当时的幸福年大乐队，这原本是一支西乐队，但是后来因为有些驻唱歌星如凌波、姚苏蓉等唱小调，需要加入华乐器，林明钊就跟一些朋友如罗长浩等加入，变成了一支中西乐队，经常到一些大酒店如统一酒楼、阿波罗酒店等演奏。当年在这个团里的还有金廷芝、周亚发、韩东畴、陈景文等，都是从事酒楼乐队演奏的音乐工作者。

1975年明钊加入北京酒楼乐队。当时在乐队中的乐手有颜明春、连荣史、戚兆明、洪南成、黄志明、林亚历等。后来又参加豪华歌剧院的中西乐队，当时还有陈景文、罗长浩等人，还有银星歌剧院，乐手有李诸福、罗长浩等。他参与的酒楼乐队还包括：东兴楼中西乐队、红星酒楼乐队、翠华楼中西乐队等。后来又参加贵宾楼乐队，队友有拉二胡的黄志忠，有一段时间他也在希尔顿酒楼的宴宾楼演奏音乐。

上世纪70年代明钊曾在北京酒楼担任职业乐手。当时的酒楼，除了爵士乐队以外，也有聘请一些华乐小组或中西混合的小乐队。那时在一起演奏的朋友有吹笙的周亚发、吹笛子的杨票敬、弹琵琶的韩东畴等。

在酒楼演奏华乐，既能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同时也能赚取不错的收入，其实是一项不错的职业。但在那个思想比较保守的年代，一般人都以鄙视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在酒楼以演奏华乐为

生的艺人。而且当时有不少演奏华乐者思想上都有左倾的现象，因此，人们对他们以演奏华乐为职业更加不以为然。然而为了生活，为了还有机会演奏华乐，明钊仍然义无反顾地继续他的华乐演奏生涯。

错失两次机会

明钊的好友扬琴手、银河民族乐团团长陈之权，也是早期青年华乐团的成员，曾经和明钊多次合作，对他比较了解。之权告诉我：“明钊因为太沉迷于华乐，他这一生中失去了两次机会。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当他在国民服役的时候，新加坡正打算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需要大批的正规军。服役两年后，军方邀他加入正规军，当时当正规军具有很好的前景，他却因为想继续玩华乐而拒绝了。另一次是在70年代当他在人民协会华乐团当指导员的时候。那时人民协会华乐团开始筹备成为职业性的乐团，邀请一些乐团的团员成为全职团员，以他当时的演奏水平来说绝对没有问题，但他还是拒绝了。因为他性喜自由，不喜欢受条约约束。不然的话，他可能已经是后来的人协华乐团的专业演奏员之一了。”人协华乐团后来发展成为享有盛誉的新加坡华乐团。

由于他只有中学毕业，在社会上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90年代以后卡拉OK大为盛行，酒楼饭店为减轻负担，很少雇佣乐队，所以明钊演奏华乐的机会越来越少。后来他就到一些善堂如慈佛善堂、同德善堂、南安善堂、普救善堂等为喜庆丧事演奏华乐，以赚取生活费。

林明钊曾参与过的地方戏曲和音乐极多。海南戏班和社团有：琼南剧社、琼联声海南戏社、琼青剧社、海南协会、海南木偶戏等；参与的广东剧团有：岡州会馆粤剧团、敦煌粤剧团；担任粤剧伴唱音乐员有：广东会馆、清远会馆、广东八和会馆。参与过的潮州音乐社团、班有：余娱儒乐社、新荣华潮剧班、老三正顺潮剧班、金鹰潮剧班和荣华清唱班（“纸影戏”）等。他还做过很多场广东街边大戏（新马港的都有）。

他也在一些地方团体如玉屿同乡会、岡州会馆、敦煌剧坊、清远会馆、琼海同乡会、精武体育会中演奏不同的乐器：笛子、唢呐、二胡、高胡、打击乐等。由于长期接触这些地方戏剧如广东戏、福建戏、海南戏、潮剧等，使他对不同戏曲的特色有较深入的理解，能掌握各种地方剧种的演奏风格和韵味，这正是今日许多华乐演奏者所缺乏的。

溺爱音乐才会无师自通

在和明钊的访谈中，他回忆起当年学笛子的经过。中学时代他就读于德贤中学（Thomson Integrated Secondary School），那是一间英文中学。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自学笛子。当时一把笛子只有新币一块钱，他拿到笛子以后，就听录音带，到书局找参考书，又向那些会吹笛子的人偷师，结果无师自通学会了演奏笛子。

有次放学后他在学校吹笛子，被校长听到了。那时候能吹笛子的人不多，校长看到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就问他能不能也教教其他同学。被校长如此抬举，他当然满心高兴地答应了。那时候学校课外活动不多，所以学笛子就成了当时学校里一项主要的课外活动。在教导其他同学的同时，他也不断地学习，自我提升自己的演奏技巧。除此之外，他也学习其他的乐器，如二胡、中胡、高胡、唢呐等。他也自学一些西洋乐器如长笛、萨色风等。

几十年来，明钊沉溺于各种不同的音乐中，包括华乐、西乐、地方戏曲、少数民族音乐而不能自拔。在音乐浩瀚的乐章中，林明钊也许只是个名不彰显的音乐鬼才，但他却代表了许许多多孜孜不倦、默默耕耘，为本地早期的乐坛洒下许多汗水的音乐工作者，今日华乐的昌盛局面，与这些音乐工作者的耕耘和付出是分不开的。

题图说明：
林明钊近照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梦圆于舞台的王秀菊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初见王秀菊老师时，除了给人具亲和力的印象外，言谈中的一举手一投足所散发的那份自信更是令我陶醉。她那股自信让她敢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怕家人的唠叨和反对，坚持参加剧团和参与演出。正是这股自信，让她为自己所塑造的角色赋予独到生命力。这种不惧被否定而敢于突破的态度不断地鞭策着她，让她无论是作为一名演员、编剧或导演，都能自信地全力以赴。

人生，勇于迈出自信的步伐，才有后面的无限可能。

王秀菊于60年代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是家中老幺。中学时期，她就读中华女子中学。中二那一年，校内举办了全校班级表演比赛，全班同学都演学生，唯有她被大力推荐饰演老师。虽说初登舞台，但她把代课老师被欺负却仍以宽容的心原谅学生的剧情演得活灵活现，博得全校师生的热泪与赞许，后来该演出也凭此获奖。

高中毕业后，父亲希望她继续到私人学校就读秘书课程，读了一阵子后发现自己完全没兴趣。于是，爸爸便委托当时已从康民中医学院毕业的哥哥向他的导师蔡玉泉中医师推荐，让她也到学院学习当一名中医师。然而，就在她很挣扎不知该何去何从时，翻开报章，看到“创艺剧团”招生，便义无反顾地前去报名，顺利地被录取。

在创艺剧团开步走

王秀菊从1982年选择参加剧团，到最后走上话剧之路，不得不提她的恩师柳明先生以及他所创立的“创艺剧团”。

柳明早期是一名电视台演员，他在1981年成立“创艺剧团”后，把李廉凤1979年文化部主办的剧本创作比赛得奖作品《晚来风急》，搬上维多利亚剧院的舞台。参加创艺剧团后，王秀菊作为学员，每周须上戏剧训练班3次：除了柳明讲授戏剧理论外，电视台配音组的语言专家朱炳权教导学员正确发音、另一名专业老师负责教导化妆。1982年，在接受训练期间，王秀菊被柳明调出来参演处女作《天问》，该剧改编自台湾剧本《女画家》。她在剧中初挑重任，饰演刁蛮的千金小姐，结果不负所望，把角色塑造得惟妙惟肖，也把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深得众人赞赏。

70年代，参加新加坡文化部所主办的戏剧节的团体，可以提名演员角逐最佳演员奖。以一个新人来说，当时王秀菊很荣幸地被提名。“多年后，我从柳明先生那里得知，当时我的分数和荣获最佳女主角的分数相差不远。有些评审原有意将

奖项颁给我，但是我的哭腔太重，结果影响台词，最后便与奖项无缘。”然而，她认为那次与奖项失之交臂是件好事，毕竟当时自己很年轻，又是一个新人，过早得奖也许会导致她太过自负。“其实，对我来说能否得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在所爱的戏剧天地里尽情地享受、尽情地挥洒自如。”

紧接着，在1983年，王秀菊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备下一部演出——独幕剧《不要再走这条路》，这是本地著名剧作家林晨的作品。王秀菊凭着第一出舞台剧《天问》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让她有机会饰演剧中艳红这个充满挑战性的角色。《不要再走这条路》讲述的是一名马来西亚女子艳红因家庭环境不好而被卖到南洋当妓女。后来当她看到一名女生即将遭遇和她相同的命运时，便想方设法搭救，不愿她走上和自己相同的一条路。王秀菊在揣摩艳红这个角色时，以独特的看法与见解，精确地塑造了一个在环境逼迫下，仍有高尚品德的角色。

一般演员在演绎角色时，很自然地使用惯用的手做事。然而，惯用右手的王秀菊却反其道地让角色用左手叼烟。这个看似细小的更动，却赋予艳红这个角色一种新的生命力与想象力。“这个角色让我有很深的体会，它让我看清一个道理，一个人是否变坏，主要看自己的意愿。当年在排练时，道具组准备了什么烟我都必须抽，而我也只在排戏时抽，戏一完我绝不抽。这些舞台经验让我明白：一个人变坏，不能将其责任推卸给他人，说是受他人影响，我们必须自己影响自己。在演戏时，我们赋予角色生命与使命，但我一旦离开舞台我就是我，我要从角色里抽离，不能再受影响。”

破釜沉舟公演《武则天》

同一年，柳明萌起了演出中国当代著名剧作家郭沫若的五幕历史剧《武则天》的念头。当柳明初次宣布他的想法时，令很多人无法置信，有些老友甚至劝他幡然醒悟，不要坏了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声誉，让剧龄仅有3岁的创艺剧团栽在《武则天》上。然而，柳明

以他那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与勇气，激发了全体团员，上下团结一致，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毫不畏惧地挑战自己的极限，终于让《武则天》这出历史人物多、对白多、演员多的历史名剧于1984年4月28日至29日于维多利亚剧院如期与观众见面。这次演出是创艺剧团艺术上的突破，成为戏剧界的一段佳话。

“感谢柳明团长给我很多演出的机会，所获得的角色也有很好的发挥空间，让我获益良多。《武则天》里的上官婉儿就是其中一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我不仅花了好大的功夫去牢记那冗长又拗口的台词，也要熟记演古装戏的台步与吐词的方式，可说是一

刻也不敢松懈。另外，由于资金有限，除了排戏外，我们也要为《武则天》





王秀菊饰演《武则天》剧中的上官婉儿



《七十二家房客》1988年10月21至23日于维多利亚剧院演出，王秀菊（右）在剧中饰演八姑

亲手制作服饰、布景、道具和头饰。对于经验尚浅的我们，是一件艰辛的差事，难免波折重重。然而，天道酬勤，我们的努力最终得到赞许。回想起来，那时虽然每一个人要身兼数职，但我们却很有满足感。剧团宛如一个大家庭，互相帮忙互相扶持。或许就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对剧团对演戏这么执着与珍惜。”

在1984年的演出后，创艺剧团因人事上的变化，冬眠了3年。1987年，创艺终于苏醒，并在翌年10月21日至23日假维多利亚剧院演出非常接地气的讽刺大喜剧《七十二家房客》。王秀菊在剧中饰演包租婆八姑，她的性格刁泼鲁莽、虚荣自大、自私自利。她的演绎与艺术剧场的梁巧珍、艺联剧团的谢芝炫有异曲同工之妙。“每次拿到的新角色，我都会细心读剧本，揣摩角色。排练场上进入角色的精神世界。这些经验在沉淀了以后，丰富了我的人生内涵，成为我日后的资源，让我能更好地教导学生。”王秀菊创造角色，要求自己独具一格。她不会刻板、不模仿，尝试要演得和别人

不一样。自信成了她的独特力量，让她乐于对着家中镜子边念台词边寻找适当的肢体语言来刻画人物。她凭着细腻的观察精准的演绎，让人物有血有肉地呈现在舞台上。

从福建会馆走上新台阶

上课充电，却有一场邂逅同行的惊喜。话说1989年，在创艺剧团的推荐下，王秀菊报名参加福建会馆与艺联剧团联合开办的剧本创作班。中国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马惠田教授，要求每一位学员都必须创作一个戏剧小品，在剧本成型后，再找班上同学一起合演。王秀菊通过这个课程意外地发现自己有写作天赋！当时她至少有3篇戏剧小品被选入出版的作品集里。“无心插柳柳成荫，之前我以为自己只会演戏而已，却出乎意料之外地发掘到自己的另一个亮点。”

王秀菊在1990年创作班结业后，福建会馆儿童演艺班正在找一名导师。当时福建文化艺术团副执行总监的黄秀玲与王秀菊同在创作班一起上过课。独具慧眼的黄秀玲力邀王秀菊加



1992年1月，时任部长符喜泉（前排右八）与王秀菊导演（前排右七）于《林谋盛烈士》演出前，在戏剧中心合影



王秀菊在福建会馆儿童演艺班进行示范教学

入福建会馆儿童演艺班的教学团队。

1991年，创艺剧团为庆祝成立10周年准备公演《林谋盛烈士》。柳明点名要王秀菊挑起导演重任。“在筹备的过程中，虽说压力甚大，但这何尝不是一种磨练呢？”排除重重困难，《林谋盛烈士》终于在1992年1月9日至11日在戏剧中心演出。当时，演新加坡历史人物不多见，这个尝试引起话剧界的关注。

之后，王秀菊成为福建会馆儿童演艺班的主要导师。她教课生动活泼、要求明确、亦庄亦谐，深受学生爱戴。她的第一部短剧《Roti Prata》在1994年于世界贸易中心礼堂公演。本地色彩浓厚，风趣幽默。她自成一格的导戏手法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当时，前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也在观众席中，对她清新的导戏手法颇为赞赏，给她极大的鼓励。《Roti Prata》也曾被邀请到马来西亚、中国厦门等国家进行交流，彰显新加坡色彩。

导演著名儿童歌舞剧《森林里的宴会》，是王秀菊在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里的另一个新尝试。该剧在1996年7月26日至28日于维多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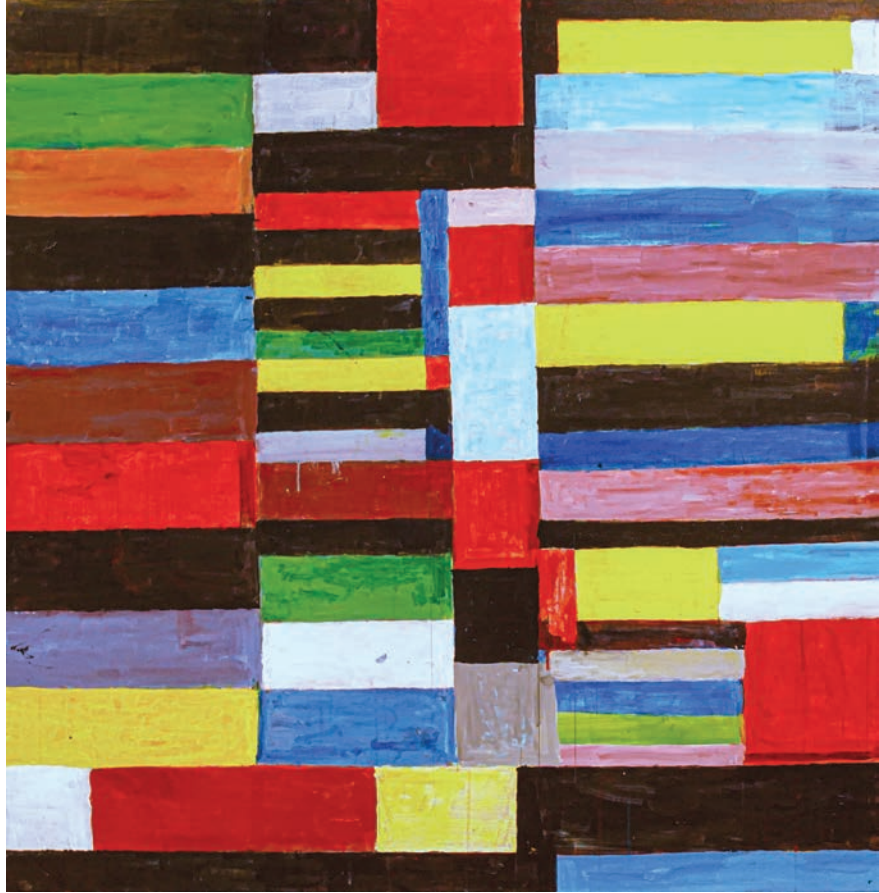
亚剧院演出时，口碑甚好，鼓舞了文化艺术团向更大型的剧目挑战，而导演的棒子自然落在王秀菊手上。两年后，她导的第一出大型音乐剧《阿里巴巴和21大小盗》在维多利亚剧院共演4场，场场满座，广受青少年观众的欢迎。“我每一次都以正能量的态度去面对每个新尝试每个新挑战，我心里会告诉自己既然文化艺术团信任我，我又怕什么呢？即使真搞砸了，对方也就知道我已竭尽所能。一旦接过新任务，我一定设法以积极的新思路来突破自己的极限。”

王秀菊在教课之余，也积极参与创作和排演多项精彩绝伦的大型儿童剧。如2000年和2012年的《神笔马良》，2003年的《巫婆山传奇》和2007年的《童言儿戏画20》等。身为导演兼老师的同时，难免让她有自相矛盾的想法，开始时令她觉得非常苦恼。“作为导演，我希望把演出做得有创意，把它推向高峰。然而，我不单是导演，我同时也是一名老师，我不能完全以我想要的创意构思，要求年幼的孩子们去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我同时也要照顾到孩子们的安全。”幸好这一路走来，她渐渐适应了自己的双重身份，在工作中不断吸取经验，从中取得了平衡。

目前，王秀菊把重心放在负责李光耀双语基金旗下的演出《宝贝宝贝小心啊》，为在籍的一小一二学生主办“戏里戏外”活动。此项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室，步入剧场，体验华语戏剧表演的舞台魅力。该活动也让学生在观看表演后参加延伸语文或演艺课，试图在潜移默化中灌输学童们正确的价值观。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但是成功是给有作为的人。王秀菊感谢早期柳明带路，让她稳步地走进戏剧的广阔世界里。一步一脚印，她把握每一个机缘，也努力把每一个项目做好。王秀菊庆幸自己有机会把戏剧当作一种工作来经营，通过自己热爱戏剧的傻劲与毅力，以戏剧为教学题材影响年轻一代。“想当年在追梦时，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当戏剧老师。今天有幸能和学生一起继续圆梦在舞台上，并通过戏剧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弘扬华族语言和文化，我觉得是一件很美的事。所以，我认为我的人生是丰富且有意义的。”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流连于纯粹与理智



文图·赵宏

毋庸讳言，从东南亚美术史的角度来看，本区域的近现代美术概念大抵是借由西方列强的殖民过程引进并发展而来的。在此之前，东南亚各国普遍只有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传统手工艺术，以及或多或少地受古代印度或古代中国影响的不成体系的艺术碎片。例如：印度尼西亚的现代美术对应于荷兰殖民者，菲律宾对应于西班牙和美国，越南对应于法国，缅甸对应于英国……新马地区略有不同，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英国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近代美术源流则是华人及早期南来华人的母国——近代中国。

具体到新加坡，大约在100年前，“早在20世纪初，新加坡就成立了‘业余图画协会’。

1929年成立的‘星洲美术研究社’孕育了南洋美术的雏形，不过真正意义上新加坡现代美术的开端还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1]，从中国南来的艺术家带来他们曾经咀嚼和消化之后的西洋美术概念，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艺术范式。但开枝散叶，落地生根之后，这些南来移民的后代，吸吮入口的艺术养分却未必如其先辈的期许——教育和语言的分化，使他们再次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向西，进入正宗的英国或者西方美术体系，或者向北，延续血脉里的中华文化艺术传承，更或者融合两者，演化成罗惹（rojak）式的文化混杂的南洋风格。多年以后，新加坡的美术史留下了一串辉煌的名字，尤其是第一代先驱艺术家，如：



之美的边界

新加坡极简现代主义画家、艺术策展人蔡荣恩

刘抗、锺四宾、陈宗瑞、张荔英、陈文希、林清河……成为标志和丰碑，亦引起西方美术史学者如苏利文教授（Michael Sullivan）等人的高度关注。

江山代有才人出，新加坡土生土长的艺术家的时代在历史的洪流中自然而然铺展开来。将近100年之后，很多人都凋零了。幸运的是，还有一位自殖民地时代起，就开始与洋人一起参与国家美术教育和艺术管理的华族人士，至今硕果仅存。他依然老神在在、行动自如，每日定时游走在书城（Bras Basah Complex）的各个画廊和全岛不同的艺术展览场地，不时用英语或广东话发表直接而尖锐的评论。他也有些神秘和古怪，半神半仙。你可以见到他，他

却从不给任何人留下联系方式。要想找到他，全凭运气——他就是93岁高龄的蔡荣恩（Choy Weng Yang, 1930-）^[2]。蔡荣恩是新加坡艺术家、艺术策展人，也是美术教育工作者和艺术作家，是新加坡独立建国后本地艺术群体的重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对新加坡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有特殊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以一己之力，参与塑造了新加坡的当代艺术景观。

蔡荣恩的父亲来自广东中山，育有11个孩子，是个大家庭。1949年，蔡荣恩毕业于莱佛士书院，初在一所小学教书，不久即转入巴特礼中学（Bartley Secondary School）任美术教师。其间，他的同事，一位澳大利亚人曾买过他的一幅作品并在日后带往英国。这大概

是蔡荣恩第一次卖画。一年之后，经副校长推荐，他进入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简称TTC）^[3]。在此期间，由于表现突出，获颁赴伦敦深造的奖学金。当时，学院每年有一次申请机会，同期只有五人获此殊荣。

1959年，蔡荣恩只身来到位于伦敦北部的英国霍恩西艺术学院（Hornsey College of Art）学习实用设计，这是非常新加坡人的标准选择——学习有实际功用的东西。1962年，蔡荣恩毕业，获英国国家艺术设计文凭^[4]。在最初的两年时间里，他也曾选修纺织面料设计、陶艺制作和家具设计。在新加坡时他已经对纺织面料设计流露兴趣并有所涉猎，因此选了这门课程。学习期间，各种专业美术的基础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在蔡荣恩看来，有些课程的水准不是很高，比如素描和速写，老师只要求学生自由发挥即可，考试也不严格。不过，有个教人体写生的女老师却非常不同，不是一味地放任学生自由发挥，常常现场示范，也会对学生作品提出建议或修改意见。蔡荣恩很喜欢这种方式，进步飞快。他的毕业设计是以中国书法为题材创作的作品，成绩优良。当时，学院里的英国老师对中国书法了解不多，视书法为一种图像设计形式，大为惊奇并深表赞赏^[5]。

蔡荣恩不甘平庸，在学校聘用的一名在伦敦很有声望的艺术批评家的推荐下，后来又设法进入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学习油画和雕塑。同一时间，还未成名的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1937-）正好也在那里就读。在此期间，蔡荣恩还获得了一份赴意大利罗马短期游学几个月的奖学金。1963年，蔡荣恩毕业，获颁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艺术教育硕士课程文凭。

从英国返回新加坡之后，蔡荣恩继续执教于师资训练学院工艺美术系，约有八年时间。1972年，他再次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创意艺术交流奖金，赴美国短期游学六个月，彼时他的推荐人是先驱艺术家刘抗之子刘太格

（Liu Thai Ker）。刘太格自1969年从美国纽约学成返回新加坡并进入政界，1979年成为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建屋发展局的负责人。此次赴美游学，蔡荣恩有机会游历大都会博物馆等一众知名博物馆和美术馆，眼界大开，也见到不少策展人，并在洛杉矶和旧金山大学的设计学院短暂进修。

1973年，师资训练学院改为教育学院，蔡荣恩则转入一间中学继续做英文教师，但同时也下定决心要在美术事业上做更多的事。后来，国家博物院院长、历史学家许亮贤（Hooi, Christopher George Liang Yin）于1974年向蔡荣恩发出邀请，让他出任国家博物院之国家画廊的策展人（一说是馆长）^[6]。蔡荣恩自1978年在此工作至1985年退休，走上新加坡艺术管理的最高舞台，并通过自身的美术教育背景，艺术批评写作和策展经验，对新加坡艺术市场的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历史性贡献。那时候，新加坡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2015）还没有成立，新加坡美术馆（Singapore Art Museum）也要等到1996年才出现。退休以后，蔡荣恩专心于绘画和撰写艺术评论，继续活跃在本地美术界。

蔡荣恩的作品以抽象线条和简单色彩为画面的主要元素。虽然他早期受到过莫奈和马蒂斯的影响，研究过光与光线的变化以及线条与色块的关系，但他最终转向了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1872-1944）。蒙德里安纯粹的秩序、清晰和强有力的构图设计感让蔡荣恩产生共鸣，决定把这种色彩与线条的极简抽象表达作为画面表现。当然，蒙德里安的线是西方几何科学基础之上的直线，精准而克制的直线是他所发现和信奉的人眼所能见到的最基本线性表征。蔡荣恩毕竟是来自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体系，他也用直线分割画面，但他的线是书法笔触所形成的虚实交叉的不规则直线，如同赵无极同样从书法中领略中国山水画和西方抽象风景的意境一样，赵无极选择的是回轮的曲线，而蔡荣恩认定的是颜色的排列，以及

接近于直线的线条。在他的画作中，观众可以体会到一种平衡感，这也正是画家所要传递出的宇宙中各种力量和能量的均衡规律。至于画家本人与观众互动的情感信息交流，就只能交付给可以得出任意结论的观众和艺术批评家了。

认同蒙德里安并不是蔡荣恩的一时冲动，早在伦敦的时候，他就已经感受到了中国书法的线条与毕加索和蒙德里安的作品之间的线与线的交流。蒙德里安执着于用最纯粹、最基本的艺术元素进行创作，颠覆了传统美术的构造规则，而“艺术让人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就是难以理解，并且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1908年，蒙德里安开始对俄罗斯哲学家、学者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在十九世纪末发起的神智学协会（theosophical movement）感兴趣”，“Blavatsky曾提出除了显而易见的实际经验之外，自然中还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真理。蒙德里安正是顺着这个角度，不断地追求精神方面的真理”——“我在一个平面上建构我的线与颜料，抒发出我认知范围内最为共通的美。自然给予我灵感，就像其他画家一样，给了我一个充满情绪的状态去创造一些东西。我想要尽可能地去接近真实，抽象出万事万物的基本”^[7]。

西方美术的发展，从易于理解的具象艺术，如古典主义，到晦涩难懂的抽象主义，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在这其中，印象派注重光与光线的效果和画面表现的整体氛围，后印象派则认为除了展现物像的光影效果，也要抒发画家的主观情感与感受，或者揭示一些物像的本质，甚至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等哲学问题。随着写实绘画体系的逐渐崩溃，艺术化身为艺术家个人的净土与极度自由的空间。艺术就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就是艺术家的创作，不再具有一般社会大众在传统意义上为其赋予的描摹现实之景的任务和目的。当然，抽象艺术可能是被大众误解最多的艺术，但实际上抽象艺术与人的认知范围只有一步之遥，跨

过了物象的边界，就会达到纯粹的精神彼岸。这种精神上的优越，影响了一大批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

蒙德里安似乎这样说过，大意是，“艺术高于现实，而且并不直接与现实相关。为了在艺术中寻找精神追求，人必须要尽可能地减少对现实世界的描绘，因为现实与精神是两个反义词。在抽象艺术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艺术理应高于现实，否则它对人类就毫无价值”^[8]。

2015年，蔡荣恩前往北京清华大学，在中新建交25周年之际，参加来自两国14位艺术家的联展，他们“分别为新加坡画家林子平、何和应、何家良、欧世鸿、蔡荣恩、许锡勇、罗福章；来自中国的画家袁运甫、黄国强、杜大恺、刘巨德、王玉良、简宣义、钟蜀珩。其中中国画家均是新加坡人民最熟悉的中国艺术大师吴冠中的学生”^[9]。

2023年，蔡荣恩在上寿之龄又创作了一个新的系列，作品尺幅也很大。在这个系列中，大部分的画面都是白色的底色，就是在现成的已经打好白底的油画布上再不均匀地平涂白色颜料，然后用各种鲜艳的颜色，画上一条条线的矩形图案。一眼望去可能会让人联想到芽笼一带的店屋墙上的木窗，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几何图形也没有，就是几条随意的、不均匀的黑线或彩线，把大面积的白色底色分割开来。线条在向画布的边缘延伸的时候会逐渐变淡，而不是突然停止。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他在不断变换线条的运行细节，就像书法中草书或行书中的拉伸和飞白，线条是扁平的，厚度也少。所有的彩色色块或白色底色都有加明显的笔触，朝着一个方向延展，有时候即使是简单的白色，也会被涂上好几层。作品上显现出接近直线的几何分割图形，作画之前他会使用一些纸质胶带覆盖不同区域，撕开后似乎给整个画面一种额外的触感和质感。在白色的映衬下，黑色的线条，以及彩色的线条和图形，似乎在释放画家心中的旋律，明亮、浪漫，而且

生机勃勃，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位接近一个世纪年龄的老人。这些画面，似乎就是蔡荣恩内心中的新加坡的街巷与家园，朝气蓬勃、新鲜，像一首风情万种的情歌。

注释：

- [1] 陈瑶：《浅析新加坡当代现实主义》，《美术报》，2018年7月30日。
- [2] 《联合早报》黄向京2019年1月27日《画家与策展人蔡荣恩——以艺术家之名，走入平面设计》文章中说蔡荣恩“80几岁”，与蔡荣恩2023年10月26日在位于Genting Lane的55艺术空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自述略有出入。结合维基百科截止自2023年6月的编辑文本，可以佐证蔡荣恩出生于1930年。蔡荣恩行事一向不乏古怪与神秘，有时故意隐瞒有些信息也在情理之中。
- [3] 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由英殖民地政府于1950年设立。
- [4] 黄向京2019年1月27日在《联合早报》报道，国家设计中心五楼当时举办“新加坡设计档案”展之“艺术家——平面设计师蔡荣恩”，此前少有人知道蔡荣恩也是平面设计师。
- [5] 蔡荣恩称，当时同在伦敦学习的另一位师资训练学院同学就是学习英文书法，并在日后返回新加坡后教授英文书写（西洋字体书法）。其他同去的人中，有学习陶艺的，也有学习油画的，还有人学习刺绣。
- [6] 蔡荣恩自述其职位是Curator of Art（艺术策展人），但也指出，出于敬意，坊间一般会尊称他为馆长。
- [7] A&C Foundation，《行走的艺术史/蒙德里安》，《艺术市场通讯》，2018年6月6日。
- [8] 同[7]。
- [9] 李琰，《中国新加坡艺术交流展走进清华园》，人民网，2015年4月2日。

题图说明（从左至右）：

《水平线之IV》，布面胶彩，130x130cm (2022)

《通往世界的窗户》，布面胶彩，137x153cm (2023)

《色彩的互动》，布面胶彩，120x150cm (2023)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Choy Weng Yang, a Singaporean artist and curator

Choy Weng Yang's father came from Zhongshan, Guangdong, China. He was born in a big family of 11 children. In 1949, after Choy graduated from Raffles Institution, he began teaching English in a primary school, thereafter, was transferred to Bartley Secondary School as an art teacher. During this period, his colleague, an Australian, bought one of his paintings which was later being taken to the UK. This was probably the first time that Choy sold a painting. A year later,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Vice Principal, he entered the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TTC). Meanwhile, he was awarded a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London due to hi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1959, Choy came to the UK to study applied design at Hornsey College of Art. In 1962, he graduated with a British National Diploma in Art and Design and in 1963 he received the Art Teachers' Certificate from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1973, the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was merged with a local university, and Choy was transferred to a secondary school as an English teacher. However, he had then made up his mind to do more in art. Hooi, Christopher George Liang Yin,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Museum and historian, sent an invitation to Choy in 1974, seeking him to serve as the curator (some address as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the National Museum. He worked there from 1978 till his retirement in 1985. He has reached the highest level of Singapore's art management at that time and through his art education background, art critiques and curatorial experience, he has also mad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art. At that time, both th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2015) and the Singapore Art Museum (1996) have not been established. After he retired, Choy focused on painting and writing art critique, and continued to be active in the local art circle.

The key elements for manifestation in Choy's works are abstract lines and simple colours. Although he was once influenced by Monet and Matisse in his early days and studied the mysterious changes of ligh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s and colour blocks, eventually he turned to be inspired by Piet Cornelies Mondrian (1872-1944). Mondrian's pure sense of order, clarity and strong compositional design resonated with Choy, and he decided to use this minimalist abstract expression of colour and line as his language of expression. Identifying with Mondrian was not an act on a sudden impulse for Choy. As early as when he was in London, he had already sensed the line-to-line exchange between the lin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the works of Picasso and Mondrian. Mondrian was obsessed with using the purest and most basic artistic elements to create art, subverting the construction rules of traditional art and this became the reason why Choy believed "art is daunting and there is no so-called standard answer".



从连台好戏 看兴趣圈内的新活力



文·蔡曙鹏

图·受访者提供

近日，戏曲演出像接力赛一样。新老剧社、中学戏曲学会，你方唱罢我登场。潮剧、越剧、京剧、粤剧、歌仔戏，一台又一台陆续和观众见面。还有作为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2024年“华彩”开幕大戏的潮剧《典妻》，醉花林邀请广东潮剧院、菲菜芭城隍庙剧团邀请广东省潮剧艺术院和厦门歌仔戏剧团、新加坡莆仙同乡联合会邀请福建莆仙戏剧院，加上新中合作项目——为苏州工业园区成立30周年主办呈献的《牡丹亭》（苏州昆剧院），真叫喜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众应接不暇。

任何地方的戏曲发展，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1]。不同剧种如此密集的演出，文教组织、宗乡会馆及文艺团体办文化讲座、新书发布会、文史展览会、美食节；中小學生演讲、翻译、讲故事、相声比赛等等。作为在新加坡有近两百年历史、民众所熟悉与喜爱的文化艺术形

式，依然有深刻认识其价值的当代群体，尽心力以不同方式守护、传承与传播，可视为当前华社对文化传承意识的逐渐加强。

新加坡中学推广戏曲的佳例

先说一个例子：武吉班让政府中学的黄梅戏《白蛇传》。黄仕英和胡桂馨伉俪创立的敦煌剧坊率先在校园播下戏曲展演的种子。1995年，戏曲学院成立不久，在教育总司长叶顺光（John Yip Soon Kwong）的支持下，于公教中学举行了戏曲进校园说明会。我介绍了戏曲学院为中小學生设计的各种特色课程，出席会议的19位中学校长和21位副校长与众多华文部主任、老师都认可这些课程的教育意义与功能。很快，就有负责老师邀请戏曲学院为学生演出如《三打白骨精》《罗摩衍那》《阿Q的故事》《林谋盛》选段等等为学生打造的节目。但我

最希望能推进的是：接受我们委派教师到学校培训学生、演出戏曲剧目，与戏曲学院共同建设校园戏曲文化。学生指导排演，才能让他们在其过程中，真正体验戏曲的博大精深与高雅精湛。

武吉班让政府中学（简称武中）是最早参加戏曲学院培训，演出完整剧目的学校。先以我和庄惠焯根据《灰姑娘》改编与导演的小戏《绣鞋奇缘》，参加戏曲学院主办的第三届“青年剧展”。徐艳芬校长（Shirleen Chee Yan-Hoon）在观看演出后，看到戏曲剧目的排演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当机立断接受排演跨文化原创剧目《罗摩衍那》在翌年公演的建议。那是我编导、朱飞跃和张辉合作编腔的黄梅戏，1999年在泰国国家剧院首演，2000年在印度巡演的剧目^[2]。负责编导的陈国华主任煞费苦心鼓励学生参加培训，反应不错。陈主任慧眼识人才，选了篮球健将张宇豪饰演拉玛王子、马来学生法伊莎（Faizah Samsudin）饰演习妲公主，印族学生范玛（Varma Vinod）饰演国王。戏曲学院组织了包括秦占宝、张莉、林嘉等人的教师团队，在武中排练了近半年后于维多利亚剧院隆重公演。2004年5月13日时任教育部长尚达曼访问武中时看了这部多元民族学生演出、取材自印度史诗的戏曲后非常高兴，离场前连连为学生的努力点赞。他在8月8日的国会发言里，表扬了武中为跨文化戏曲所做出的努力。《罗摩衍那》翌年受印尼廖内省政府的邀请，到其首府丹戎檳榔举行的国际艺术节演出。自此，戏曲活动在武中开花结果，成为我国校园戏剧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不久前，在武中薛哲禧校长领导下，师生共同筹备的马来话剧和华族戏曲在4月底公演的消息传开后，泰国电视台Sittan导播特地带领摄影组到学校拍了排练纪录片。曼谷大学Punnasak副教授组织了表演艺术系师生21人来看《白蛇传》，观赏新加坡学校传承传统艺术的成果。《白蛇传》共有演员39位，由林嘉移植为黄梅戏《游湖》《惊变》《水漫》和《断桥》。武中舞蹈组学生演出多段群舞强化角色情绪，或渲染剧情变化气氛，并在《水漫》一场跑龙套，文武戏兼备，让曼谷大学师生赞不绝口。Punnak副教授赞道：“武中学生马来话剧服装布景色彩斑斓，剧情轻松有趣又有教化功能。《白蛇传》武

戏节奏的把控精准、青蛇和天将对打，快、狠、准，反映了学生勤练的可贵态度与精神。龙套演员鱼贯登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武中开展传统艺术学习活动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参考。”

在武中负责戏曲活动的陈国华主任说：“历年来在一位又一位校长的大力支持下，武中的戏曲演出，已经成为学生皆知的特色活动项目。培训学生参与戏曲活动，目的不只是为了学技艺，更在背台词、记唱词、学表演的过程中提高学习华文的热情。学校也安排马来话剧和戏曲节目同台演出。同学们也从表演的内容，接触到彼此优良的文化传统美德，领略母语文化和舞台艺术的优美，并且学会合作、自律，强化了团队精神。”

历史悠久京剧团的新面貌

十几年前，宗乡总会主席蔡天宝谈及新移民融入课题时，曾提出应以“兴趣圈”打破会馆社团地缘与血缘的传统限制，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戏曲圈正是“兴趣圈”之一。为数不少的新移民二十几年来悄然加入多个剧种的戏曲圈，给戏曲圈带来新的活力。最近两个剧团的演出，展示了这股力量给京剧和越剧带来的新面貌。

京剧在新加坡有130多年历史了。1893年12月27日从福州南来的福祥升京班，是拥有90多人的大戏班。该戏班在庆升平戏院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持续演到1894年1月6日，天天宾客如云，带动了对京剧并不熟悉的新加坡民众观戏的热浪。之后，中国京剧班接踵而来，演出场所多样化，商演卖座。到了30年代，茶楼听戏，游艺场看戏，渐渐成为时尚。然而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点燃了侵略战争的火苗。就在日军向东南亚挺进时，新加坡一批热爱京剧的社会贤达，响应林庆年的号召，成立了平社。这个业余京剧团体成立时，郁达夫写了一篇庄严的发刊词：“敌国兴戈，千古著盖世拔山之勇。同人等集成平社，原为陶情；戏衍渔龙，无非言志。盖亦欢娱不忘救国，博弈犹胜无为意也……天下兴亡，既尽匹夫之天责……”不久后，平社也投入义演筹赈抗战的队伍。

80年来，随着文化生态和语言环境的不断变化，京剧和其他新加坡剧种一样，起起落落，也曾面临“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困境。不过，平

社在4月28日推出筹划已久的梅兰芳重要剧目《凤还巢》，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竟座无虚席，难得的是，其中有不少青少年观众。《凤还巢》是梅兰芳率领剧团到美国六大城市巡演前，由齐如山执笔的一个新编戏，由承华社于北京中和园首演。显然梅兰芳和观众都喜欢这部喜剧，也许是因为闺门旦应工的喜剧很少的缘故，但他也在强调过这部喜剧不能演成闹剧。不断多次演出的《凤还巢》，几经研究琢磨，终于打造成一部久演不衰的好戏。平社的演出，让观众看到这部生旦净丑行当整齐、能展现艺术特色的京剧好戏。

年长的观众可能看过李翰祥、高立导演的黄梅调同名电影。除了男女主演李香君和金峰外，也还记得蒋光超扮演朱焕然的可笑形象。这个处处夸耀自己财富与地位的人，糊里糊涂冒名顶姓，结果娶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女子，闹出大笑话。京剧《凤还巢》也是由朱千岁（新移民工程师王博明饰演）这个角色带出第一个笑点。他小题大做，出一次门，在短短时间内，借情境变化，三次更衣，炫耀财富。这个喜剧情境构置正是笑点的客观基础。扮演者避免了明末清初戏曲批评家丁耀亢《啸台偶著词例》提出的“十忌”之第十忌：不作刻意的夸张。扮演者若无其事地指示家丁配合他换衣，荒唐的行径，让人觉得好笑，不会因为故作夸张而导致“观听起厌”。

《凤还巢》里的刘伟嘉，亦生亦旦。前半部演程雪娥，后半部演穆居易。来新加坡15年，业余到平社学戏演戏。他演程雪娥，雍容尔雅，举手投足，落落大方。新秀常熙雅，端庄秀丽，也把握住了大家闺秀的风范。最后洞房一场，编剧安排李云峰扮演程浦、刁庭安扮演周公公、水江天扮演洪功。3人都想搞明白大喜之日，为何被封为镇威将军，又娶了美娇娘的穆居易竟满脸怒容。这段戏的大段念白，如果节奏没掌握好，戏就显得拖沓。但3位新老移民演员和刘伟嘉扮演的穆居易，来回传话答话之间，一来一往紧扣，保持住其趣味性和喜剧性。尽管有时演员游离在京白与韵白之间，观众乐在其中。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说：“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台词中一些笑点，发挥了作用。前面穆居易和程雪娥都曾经有担忧、有挫折，最后终于有了美好结局。

正是王国维概括古典小说和戏曲时说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凤还巢》也符合亚洲戏剧的以大团圆的“环形结构”。

热爱京剧的任伟辰，多年前曾受秦占宝邀请，合作演出实验京剧，敢于探索，精神可嘉。这次，他跳出京剧的规范，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程雪雁。夸张的表演和几句英语台词更让少儿观众乐不可支。然而，戏曲丑行对饰演的人物有着特殊的表演要求，装扮上也讲究“丑中见美”为宜。

越剧“兴趣圈”凝聚各类人才

发源于浙江绍兴嵊州，越剧又称绍兴戏。越剧在新加坡历史比京剧短得多，从1998年戏曲学院邀请南京越剧团水小燕老师开办了本地的第一个越剧课程至今，不过26年。越剧却奇迹般的在这里落地生根，成为深受年轻观众喜爱的剧种。其中大部分观众和热爱越剧的本地演员，并非浙江籍贯的华人。学习以嵊州方言为基础、吸收了中州音韵和官话的语言有难度，但因为喜欢这个剧种，就学听、学唱、学演。

在本地定期演出、积极在社区推广、到海外参加戏剧节的新加坡越剧团竟有6个之多，数量超过在本地历史更悠久的京剧、歌仔戏和琼剧团体。这个奇迹的出现是因为越剧这个只有百多年历史的剧种，非常有活力。从20世纪40年代袁雪芬与田汉紧密合作开始，越剧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重视剧本的文学性，善于吸收各种艺术表现样式的优点，不断提升创造力。越剧又是一个努力调节自己、开拓不同群体欣赏需要的剧种。舞台表现方式不断充实，服装设计与舞美设计讲究优美清丽，审美价值较高，因此即使对其语言不熟悉，也乐于观赏。

本地历史最久的越剧团是大唐文化传播（原为2000年初成立的上海越剧欣赏学会，创办人符国婉）。国婉是1998年最后一个报名参加戏曲学院越剧课程的学员，但后来她对推广越剧做出巨大贡献。1999年7月1日，她与《狮城越剧第一篇》参与者的周雅兰，在马林百列民众俱乐部创立了“上海越剧欣赏学会”，立志“培养年轻人对戏曲艺术的欣赏能力，并且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这是新加坡第一个业余越剧



潮剧《典妻》的老秀才（陈运龙饰）和被典当的妻子（陈纬恬饰）



华族戏曲工作室的《赵氏孤儿》中，林楚强饰程婴，陈巧鸾饰庄姬



《凤还巢》男女主角：刘伟嘉（右）和常照雅（左）





南华潮剧社在柬埔寨金边演出的喜剧《打石记》中的母亲（林惠枝饰，左）、不孝子（张明福饰，中）、恶妻（佃伍妹饰，右）



《凤还巢》两位男旦刘伟嘉（中）与任伟辰（右）饰演姐妹



大唐文化传播的越剧《五女拜寿》谢幕。左四为剧团创办人符国婉，饰杨夫人

团体，9个月后再一连两晚，在维多利亚剧院首次公演。25年来，几经辗转，易名为大唐文化传播，2005年从私营团体转型成为一家非营利机构，并在2017年获得了艺术慈善机构地位。

这些年来，大唐文化传播排除万难组织许多大大小小的演出，也在中国、马来西亚和越南呈献传统越剧或原创越剧。国婉广结善缘，其董事部人才济济，近年华丽转身，队伍年年壮大，一年一大戏。最近公演的《五女拜寿》，聚集了舞台经验丰富的新移民和热心学习越剧的本地多年龄层演员，并由华乐界青年才俊组成的聚乐团现场伴奏，中国越剧名师杨晓海指挥。现场音乐的伴奏，让演出质量大幅度提升。

《五女拜寿》是浙江著名剧作家顾锡东的代表作，主题深刻、唱腔流派多、角色个性鲜明，是一部展现剧团整体表演水平的好戏。令人赞赏的是活跃于越剧舞台多年的张思梅（饰演陈夫人）、郑松青（饰演俞志云）、夏雅梅（饰演杨元芳）和方艳玲，凸显了抱着终身学习态度的业余演员的不俗成果。不同年代来我国的新移民林嘉（饰演陈动念，潮剧演员）、查琳娣（饰演杨继康，评剧演员）、徐赫阳（饰演邹应龙，京剧演员）亦为演出添彩。

戏曲“兴趣圈”，是新移民寻求融入本地社会的充满生活趣味的渠道，戏曲舞台也因为新移民的加入而更精彩。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戏曲文化的建设，也急需提倡自省精神。每一个项目完成后，反思台前幕后的种种不足，听取批评，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探索艺术理论是进取之道。自省风气若能蔚然成风，戏曲舞台，必更精彩。

注释：

- [1] 黄仕忠，《探寻戏曲史研究的新视野》，《文化遗产》2021年第6期。
- [2] 董上德，《外国故事戏剧化的东南亚实践》：《实叻埠十部戏》，南华潮剧社，2021年，第148-159页。

题图说明：

武吉班让政府中学的《断桥》李明彦（左）、黄忆欣（中）和傅胤豪（右）有精彩演出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星洲海峡华人传承

同安白礁王沧周家族



文图·陈煜

1872年5月18日，王有海、九河与沧周分别捐献500元，集资购买面积约221英亩多的土地，位于今武吉知马谦福路一带，习称“姓王山”，王氏宗人称之为“太原山”。这三位原籍福建省同安县白礁（今漳州龙海角美镇白礁村）的同宗叔侄，被视为王氏慈善（开闽公司）的献山人，其中王有海与九河为南来第二代海峡华人，沧周（Chong Chew，字登瀛，1835-1888）是三人中唯一出生于原籍的华侨。

在为本地开闽王氏编撰的系列纪念刊中，王秀南对沧周略有介绍：“年少南来新加坡，未受正式教育，凭其刻苦耐劳与聪明才智，投身商场，渐露头角。创设‘德昌号’，发展船务，与小吕宋贸易。经营土产。勤俭朴实，业务蒸蒸日上。”但在王沧周的逝世日期及安葬之地的记录上有误。



王沧周绘像（图源：《王氏立姓开族百世谱》）

2006年王沧周玄孙女Chwee Im主持出版题为《从白礁而来：王沧周家谱》（The Journey from White Rock: The Ong Chong Chew Family Tree），本文简称《王沧周家谱》。在这本以英文撰写的288页家谱中，除了由Chwee Im主笔撰写的文稿，其他后裔亦写下对于祖辈的回忆，为王沧周家族留下珍贵的图文记录，也为华侨华人史研究提供详实的案例。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有关王沧周及其子孙的新闻报道，比对《王沧周家谱》的记录以及吴安全发现的墓葬信息，梳理王沧周家族南来第一、二代的生平经历，探讨华侨华人的家族传承，与祖籍地及宗乡团体之间关系的转变。

同安白礁华侨王沧周

根据白礁王氏族谱，沧周排行为17世，其下南洋的时间未知，相信是在成年之后，当时南洋已有同宗乡亲，例如王有海之父坤殿等。与许多同安先辈一样，王沧周发迹于驳船业，后创办德昌号（Teck Cheang），主要从事航运与木材生意。据其后裔回忆，德昌号设在如切河畔，今森林大厦与如切中心之间的位置。王秀南则记录德昌号经营往来小吕宋（菲律宾）船务。早期新闻报道显示，王沧周曾代表丝丝街与克罗士街的业主向市政厅提出改善区域内市政设施的请求，为女皇金禧庆典基金捐款等。

王沧周于1888年6月5日在丝丝街39号宅邸去世，未葬于太原山，而是长眠于1879年他购置的直落布兰雅产业，这片家族园地有23英亩多。王沧周生前累积可观的财富并留下遗嘱，1888年11月6日新加坡高等法院确认遗嘱执行人为其在新加坡的二房妻子陈新娘（Tan Sin Neo）和次子王祈顺（Ong Kee Soon, 1867-1925），一年后公告其遗产价值为23万970.38元，推测

是不动产的估价。

王祈顺留下一份1888年9月18日颁发的前往菲律宾、中国、日本等地的护照。作为海峡华人英籍民，他曾持此护照返回白礁祖籍地执行父亲遗嘱，并留下一份遗嘱执行状况的详细记录，显示王沧周的家庭关系与遗产分配。

王沧周去世时元配黄氏（Wee Tiam Neo）、三子祈振（养子）与四子祈安（养子）、以及他的姐妹Choh Neo均在中国。王祈顺通过律师支付黄氏应得遗产400元，交付三弟和四弟各自应得的遗产200元，未能寻获并支付姑姑应得遗产200元。此外，他亦记录在中国的两位弟弟共同居住于祖籍地的产业，该产业在30年内不能出租或抵押。

王沧周在新加坡的长子锦照（又写作锦昭，Kim Cheow）获得遗产1万元并继承德昌号。其妻陈氏（Tan Tay Neo）应得遗产1000元，其子Ong San Tee（王沧周当时唯一的孙子）应得遗产1万元。不幸的是9个月大的男婴在其祖父过世后6天早夭，未能继承该笔遗产。次子祈顺获得遗产3万元，其他所有不动产以及经营木材生意的王沧周公司。其妻Seow Pin Neo应得遗产1000元。

因为王沧周遗嘱未能完全得以执行，锦照将遗产执行人控上法庭，于1896年7月30日依法确认其应得遗产及相应利息。两年后，其妻陈氏亦通过法律手段确认应得遗产。推测王祈顺写下详细的遗嘱执行记录，是在诉讼期间应法庭要求所提呈的。

星洲海峡华人王祈顺

王沧周将在新加坡的二房陈氏列为遗产执行人之一，遗嘱每年支付其360元的生活费，以及最高3千元的丧葬费。《王沧周家谱》提及，因无法偿还每月贷款，丝丝街39号宅邸与厦门街91号店屋于1891年为新加坡保险公司所没收。陈氏与祈顺母子失和，陈氏搬到里峇峇利宅邸，1911年9月17日在那里去世。王祈顺及其家人则居住在厦门街90号。

王沧周将次子祈顺列为遗嘱执行人，而非长子锦照。《王沧周家谱》称锦照继承德昌号，经营驳船业相当成功，生活优渥，热衷体育运动，以打网球和踢足球而闻名，1885年参与创办海峡华人俱乐部，1909年去世。早期新闻报道显



王祈顺像
(图源：《王沧周家谱》)

示王锦照曾出席名流聚会并发表演讲等。

王祈顺与妻子萧氏育有两子两女，长子守谦（Siew Kiam, 1889-1975）、长女Seok Tin、次子守让（Siew Jiang, 1897-1971）、幼女惜珠（Seok Choo）。《王沧周家谱》提及王祈顺夫人来自爪哇，生性刚烈，是慈禧太后般威严的族长。王祈顺英俊潇洒颇有女人缘，导致夫妻关系破裂，临终前想要见妻子最后一面亦被拒绝。

王祈顺继承主营锯木与木材贸易的王沧周公司，1899年5月1日与两位合伙人成立德春公司（Teck Choon & Co.），地址在劳明达街57号。王祈顺有着活跃的社交生活，作为海峡华人代表出席在中华总商会举行的会议，为爱德华二世庆典基金、威尔士王子战争纾困基金等捐款。

王祈顺的两个儿子都接受良好的英文教育。长子守谦在英华学校完成初级教育，1903年10月进入莱佛士书院，1904年底通过7号班所有科目考试，于1905年7月11日获得证书。1909年7月13日，年满20岁的守谦加入德春公司成为合伙人。次年，王祈顺将名下的不动产代理权授予他。在社交方面，王守谦参加多个社团组织，为一些筹款活动捐款。

王守谦比大哥守谦小8岁，亦进入莱佛士书



迁葬于太原山的王沧周墓。(图源: 吴安全)



迁葬于太原山的王锦照墓。(图源: 吴安全)

院学习，成绩优秀，1911年获得胡莱特奖学金（Hullett Scholarship），毕业后加入德春公司，后与他人合伙成立公司Chop Teck Hoe经营土产贸易等。王守让的社交活动亦很活跃，是一些机构的核心成员。

值得关注的是，1919年王祈顺曾与王三杰、王文达，代表闽籍王氏出庭解决政府征用太原山部分土地赔偿事宜，草拟慈善信托章程，1923年12月28日获得批准，1924年4月2日正式成立王氏慈善（开闽公司）委任三位信托人管理产业。当时王祈顺仍在世，但他及两子都未能成为信托人，其他两位献山人——王有海之子长顺、九河之孙瑞洲成为两位世袭关系的信托人，王金鍊则是第三位信托人。

家族不动产业与墓葬

《王沧周家谱》展示了部分家族留存的法律文书，包括土地契约，为了解王沧周与祈顺父子的商业活动提供宝贵信息。王沧周于1864年6月23日购买位于大巴窑的一块土地，显示而立之年的他已累积相当财富。1870年代王沧周的收入相当丰厚，除了1872年捐献500元给闽籍王氏购置太原山，他于1874年5月6日购置厦门街产业，1876年购买武吉士的土地，1885年2月25日购买海南街七间店屋。

王祈顺继承了父亲购置的这些不动产，也通过公开拍卖购置相当数量的不动产：包括1905

年1月购置桥北路583号；1912年购置基里尼路30号B；1913年购买仰光路一块空地；1916年购置硕莪街6号等。王祈顺父子及德春公司名下的产业，还包括加东安珀路15号、Sea Avenue 46A、安顺路73号和74号等。

在王祈顺购置的产业中，最负盛名的是位于史各士路（Scotts Road）的约克屋（York House），即今远东广场所在地。根据《王沧周家谱》记录，约克屋始建于1884年，后多次易手，1918年12月王祈顺以4万元的价格买下。除了日据时期为日本人占用外，约克屋是王祈顺后裔共居超过25年的宅邸。1950年11月10日王祈顺夫人在此去世，享年85岁，安葬于太原山。推测在她去世后，子孙将这一产业出售，后改为约克酒店（York Hotel）。

王沧周家族直落布兰雅园地曾有四座坟墓，1925年政府强制收购该产业，1932年计划迁坟，守谦守让两兄弟通过律师向政府提出抗议终止迁坟。1953年4月7日，这四座墓中的三座迁到太原山，一座迁到林厝港。2016年9月17日，探墓人吴安全在太原山与武吉布朗坟场交接处发现三处白礁王姓墓葬，墓主分别是王登瀛（即沧周）、王锦照、陈锦锦（锦照妻子）。这三座墓就是从直落布兰雅迁葬的，另一座迁到林厝港的墓主推测为王沧周夫人陈氏。

王祈顺于1925年3月11日在约克屋去世，享年58岁，安葬于太原山。其墓地规模相当大，



迁葬于太原山的陈锦锦墓 (图源: 吴安全)



现存于天猛公艺术基金会的王祈顺墓碑

墓构件均为雕刻精美的石雕，彰显家族的社会地位与富裕程度。这座墓受到罗尼大道开辟的影响而迁葬，残留墓构件现存于天猛公艺术基金会草坪。1951年王祈顺夫人去世后，安葬在其夫墓的前方，墓地有相当规模，但较为简朴。

结语

早期南来的华人往往因忙于谋生，且多以原乡传承为重，鲜少留下家族谱系的记录。《王沧周家谱》的出版，展现十九世纪中期南来华人家族的传承、他们在本地与原乡建立的家族关系、家族产业的购置与墓葬等，有助于理解华商家族与华族社团之间的关系。

由同安白礁南来的王沧周有着两头亲：在原籍的元配领养儿子，致富后兴建宅邸供妻儿使用；在本地另建家庭助其事业发展，养育儿子接受教育，成年后参与并继承家族生意。商业上的成功使得他们参与宗乡团体活动，通过捐输以提升社会地位而成为闻人。王沧周次子祈顺维持与闽籍王氏宗亲团体的联系，但孙辈渐渐脱离宗乡网络，活跃于以英文为主的海峡华人社群。

2004年11月初，王受谦的孙子Chin Leong前往厦门找到祖籍地白礁，令正在编写家谱的后裔倍感鼓舞。他们在书中表达对于高祖王沧周的感恩：“我们向您致敬，因为您的敢于梦想，敢于与众不同，您的无所畏惧，我们才能在这里。”《王沧周家谱》出版后，后裔在武吉巴督街王氏慈善（开闽公司）骨灰翁安置所，为王沧周及两位夫人设置纪念龛位，重新建立起与宗亲机构的联系。

2004年11月初，王受谦的孙子Chin Leong前往厦门找到祖籍地白礁，令正在编写家谱的后裔倍感鼓舞。他们在书中表达对于高祖王沧周的感恩：“我们向您致敬，因为您的敢于梦想，敢于与众不同，您的无所畏惧，我们才能在这里。”《王沧周家谱》出版后，后裔在武吉巴督街王氏慈善（开闽公司）骨灰翁安置所，为王沧周及两位夫人设置纪念龛位，重新建立起与宗亲机构的联系。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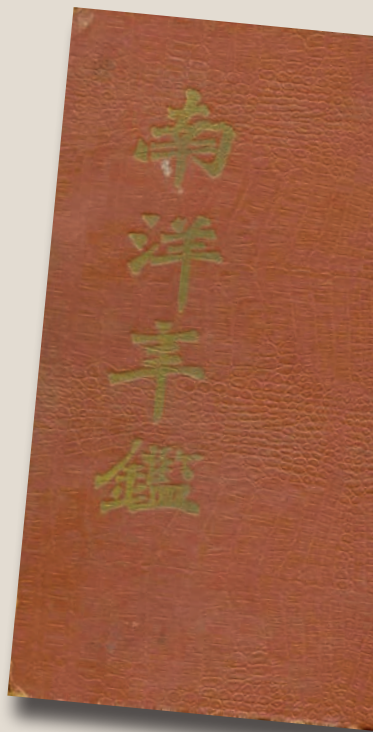
王氏慈善（开闽公司）里王沧周及两位夫人的纪念龛位

南洋旧时光里的 两“书”一“会”

《南洋年鉴》《星洲十年》和“南洋学会”



文图·章良我



读今人描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亚暨新加坡的南洋历史，发现其中许多史实都来自两本书《南洋年鉴》和《星洲十年》以及“南洋学会”出版的书籍与杂志。其实，相对于“东南亚”一词，“南洋”是一个旧词，其分界线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在大众口味偏好“古早”的今天，旧词却颇受一些人的热衷与喜爱，于是便流行起来。

两书缘起

众所周知，《南洋商报》创刊于1923年。它原由陈嘉庚独自经营，1932年组成南洋商报有限公司，1937年由李玉荣接办，任社长兼总经理，董事会主席是李光前。《星洲日报》创刊于1929年，是胡文虎“星”系报章之一。这两份在新加坡出版发行的报纸先后于1939和1940年，分别推出两部巨著《南洋年鉴》和《星洲十年》，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影响深远。《南洋年鉴》为16开本，共1500页，内容所述包括整个东南亚地区；《星洲十年》为大32开本，1300余页，文字所记偏重新加坡和马来亚。称这两本书为皇皇巨著，一点都不为过。（《南洋年鉴》在战后1951年又由南洋商报社出了第二版。）

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号称华侨最高学府的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主任刘士木在《南洋年鉴》所作序文，当《南洋商报》总编辑傅无闷计划编辑《南洋年鉴》时，曾商请刘氏主持其事，而刘氏因身体抱恙（心脏衰弱），未能允准。后来，主编工作就落在了南来的中华书局编辑部的郁树银肩上。当时，《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

报之间互相竞争激烈。南洋商报社《南洋年鉴》的出版，促成星洲日报社决定编纂《星洲十年》。

《星洲日报》总编辑关楚璞在《星洲十年》序中记载道：“胡（昌耀）社长纳余议，呈诸董事局报可，乃特设编纂处，聘姚楠先生为负责编辑，张礼干、许云樵两先生为专任编辑，而本报编辑部同事郁达夫（文艺副刊主编）、钟介民（《星洲日报》总编辑）、张子斌、张匡人（地方版负责编辑）、李葆贞（女士、英文编辑）诸先生及外勤诸同事，均与余分负编撰、调查、校阅之责，计阅一年而书成。”

上述名单中的姚楠于1935年1月乘搭英国邮轮，从故乡上海来到新加坡。他当时受雇于制造飞虎牌油漆的上海振华公司，被公司外派南来新加坡，先期下榻位于牛车水摩士街20号的代理商行永安祥号的二楼。姚楠本人在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曾经工作过，南来之后工余给《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投稿撰文，最后成为东南亚历史的研究者。他在日军南进、兵临新加坡本岛的1942年1月底，与郁达夫的儿子郁飞，乘搭同一条船，离新北返，辗转回国。



根据姚楠本人的忆述，负责编辑《星洲十年》的人选最初也是刘士木。然而，“士木先生既已不愿主持编纂《南洋年鉴》，当然也不会同意到《星洲日报》去编《星洲十年》”，于是曾经与他有同事之谊的姚楠就被推荐去担任《星洲十年》的责任编辑。《星洲十年》编纂处于1938年冬成立，姚楠在1939年2月才正式参加工作。“因为其他几位编委各有重要任务，只能提供一些资料，或者充当顾问”，姚楠就报请社长批准，增加两位专任编辑来充实编纂处的力量。这两位就是姚楠委托中华书局经理徐采明推介的张礼千和许云樵。

再续前缘

在《星洲十年》出版后，编纂处并没有马上被撤销。在姚楠的建议下，星洲日报社在《星洲日报》于1940年2月推出两种副刊，由姚楠总其事，许云樵负责编辑《南洋史地》版，张礼千负责编辑《南洋经济》版。两种副刊每天轮流出一期，各占用半版篇幅。

《南洋经济》前后出了30期，《南洋史地》共出了42期（1940年5月30日停刊）。1940年

6月7日，新副刊《南洋文化》版发刊。星洲日报社还成立了出版部，由姚楠任主任编辑，许云樵和张礼千仍任专任编辑，除了编辑《南洋文化》版，日出一期外，还计划编辑《南洋丛书》。不幸的是，由于报社内部人事更迭，星洲日报社出版部成立仅两月，《南洋文化》仅出了38期，就落得一个前者遭解散、后者被停刊的结局。

阴差阳错的是，由亚洲华人主持的第一个东南亚研究学术团体——南洋学会却在同时期创办。1940年3月17日，在大坡余东璇街南天酒楼，南洋学会宣告成立。在七名创始发起人中，除了在新加坡的关楚璞、郁达夫、张礼千、许云樵和姚楠之外，还有在槟榔屿的刘士木以及在中国的李长傅。首批会员中还包括新加坡的陈育崧、韩槐准以及中国的朱杰勤等。七位发起人都成为南洋学会的首届理事，姚楠被推选为常务理事。这7人中，大多数都是《星洲日报》的同人，其中的刘士木、李长傅和姚楠又是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前同事。

南洋学会成立后，即以姚楠的寓所中峇鲁永丰街61号二楼为会所，租用邮政信箱709号。《南洋学报》创刊于1941年6月，主编是许云樵，他一直把学报编到第13卷才告引退。日本侵占新加坡时，南洋学会随北撤的姚楠迁至中国后方，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学会会址设于姚楠在重庆的寓所山洞和尚坡“漱石山房”。在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下，重庆时期的南洋学会出版了丛书八种，以及《文史杂志》南洋专号一辑。

二战结束后，南洋学会于1946年又迁回新加坡。南洋学会成立时，全名定为中国南洋学会，英文称作The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简称SSSS。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化，中文名称也有所改变，成了今天的新加坡南洋学会。

参考文献：

- [1] 姚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加坡华人对东南亚研究的开拓工作》（吴伦霓霞、郑赤琰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香港中文大学，1989）。
- [2] 姚楠：《星云雨集》（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1984）。

（作者为本地作家）



文图·李国樑

旷野鸣沙

开埠以来新加坡从南部市区向外围垦荒，每个地貌的缘起都有其独特含义。加基武吉（Kaki Bukit）属于勿洛的8个分区之一，约百年前开发成马来人安置区，与居住在巴耶利峇葱茅园的华人为邻。40年前加基武吉进入蜕变阶段，成为凝聚3万多各族居民的市镇。2017年地铁滨海市区线全面通行，列车驶入勿洛北和加基武吉两个地铁站，老居民深深体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境界。

多数组屋区边缘都有一两个轻工业区，让居民在原地安居乐业，加基武吉则有7个工业园、科技园和科技中心。虽然名为“科技”，这里所走的并非高端科研路线，租户多数是中小型企业，以汽车维修与相关周边工业为主。预期2030

年巴耶利峇空军基地搬迁后，建筑高度放宽，新一轮变化在所难免。崭新的加基武吉民众俱乐部设立了展厅，为昔日保留些许蛛丝马迹。

“山脚”的马来村

“山脚”是加基武吉的马来文直译，不过一个甲子前小山坡已被铲平，土壤被运到东海岸填海。

加基武吉的初期发展源自1920年代末。当时政府计划兴建加冷机场，友诺士（Mohamed Eunus bin Abdullah）说服加冷河口一带的居民，迁徙至山脚下重建家园。当时友诺士受到吉隆坡市区发展的启发，提议让马来人以一贯的生活方式集居，既可保留马来文化精髓，亦可提高马来民族主义意识。友诺士运筹帷幄，最终获得



加基武吉组屋和工业区取代百年前的甘榜马来由（惹兰友诺士马来村），突显新加坡从“部落认同”进入多元种族集居的历程

加基武吉 城水交融的山脚风情

立法委员会同意，拨款购买土地兴建甘榜马来由（Kampung Melayu）。

马来村所承载的最重要元素，是本地“马来人”名称的源起。从前的新加坡人口普查报告没有马来人这个称谓，而是称为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武吉斯人（Bugis）、亚齐人（Achinese）、巴达人（Batak）、爪哇人（Javanese）、峇厘人（Balinese）、巴韦安人（Baweanese）等。友诺士和一群有志之士成立“新加坡马来人联盟”（Kesatuan Melayu Singapura），通过普及马来人教育来提升族群的社会地位。马来人联盟成立后，从马来群岛前来安家的族群统称为“马来人”，一度掀起何谓马来人的激辩。我们的教育政策加强了群岛族群与其他种族的融合性，有些马来人认为四海之内

是一家，有些则投诉后代不知道先民从何处来，已经丧失民族的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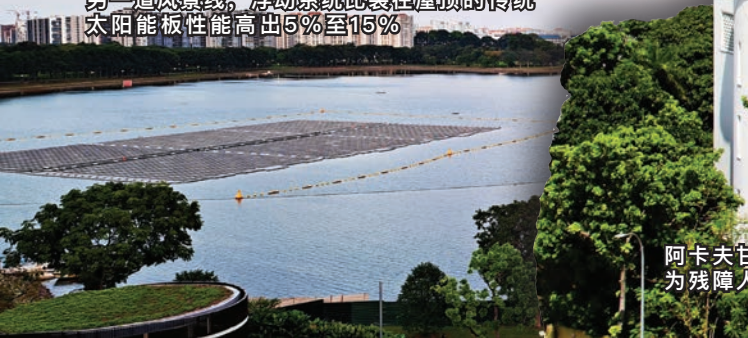
友诺士原籍米南加保，在甘榜格南的马来学校接受启蒙教育，莱佛士书院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基于对马来社会的影响力，殖民地政府委任他为首位马来族立法委员。友诺士去世后，甘榜马来由易名为惹兰友诺士马来村（Jalan Eunus Malay Settlement）。

殖民地时代采纳各族群分而治之的管理方式，“部落认同”确实提高族群凝聚力，但放诸于现代社会，处理不当的话会带来反效果。80年代政府征用这个地方，把马来村转型为多元种族住宅，昔日在这里生长的村庄小孩，成为第一代加基武吉组屋居民。毕竟山脚下是个马来村，故土情怀难以磨灭，目前马来居民约23%，华人



惹兰友诺士备水池储存净化后的水源输送到千家万户

勿洛蓄水池的浮动太阳能板正是新常态下诞生的另一道风景线，浮动系统比装在屋顶的传统太阳能板性能高出5%至15%



充满北欧自然风光的矿湖是昔日的采沙场遗迹

阿卡夫甘榜马来由回教堂是本地少数为残障人士开办宗教班的回教堂之一

65%，跟全国种族比率还是有些差距的。

马来甘榜不可或缺的是祷告场所，来自阿拉伯的阿卡夫家族为居民建设宏伟的阿卡夫回教堂（Masjid Alkaff）。一个甲子后，回教堂搬迁至加基武吉4路（Kaki Bukit Road 4）和勿洛水池路（Bedok Reservoir Road）交界，易名为阿卡夫甘榜马来由回教堂（Masjid Alkaff Kampung Melayu），它也是本地少数为残障人士开办宗教班的回教堂之一。

逼出来的水源传奇

加基武吉4道（Kaki Bukit Avenue 4）的惹兰友诺士备水池（Jalan Eunos Service Reservoir）是个10万立方米的水库，约等于4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惹兰友诺士备水池于上世纪50年代初建，目的是为了增加供应量给芽笼、加东和樟宜地区。随着东部地区人口激增，十多年后备水池进行扩建。勿洛蓄水池的水源经过勿洛自来水厂净化后储存在备水池，再由地下管道输往千家万户。

由于本土人口密集，公共设施一物多用已成新常态。勿洛蓄水池是个水上运动场，也是举办滑水和龙舟赛的地方，浮动太阳能板则是新常态下诞生的另一道风景线。由于蓄水池较清凉，浮动系统的效率比装在屋顶的传统太阳能板高出5%至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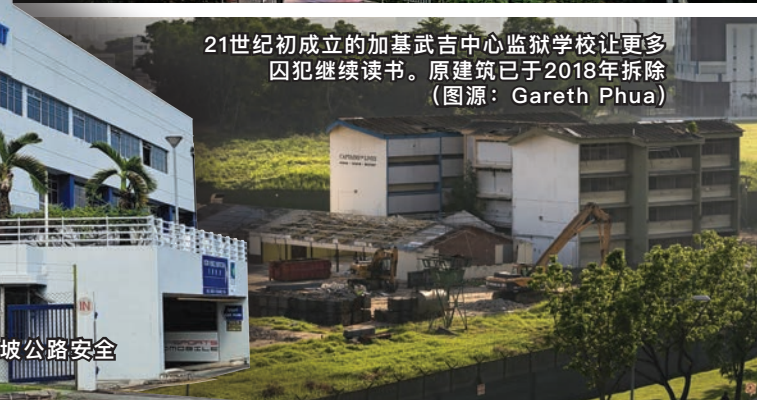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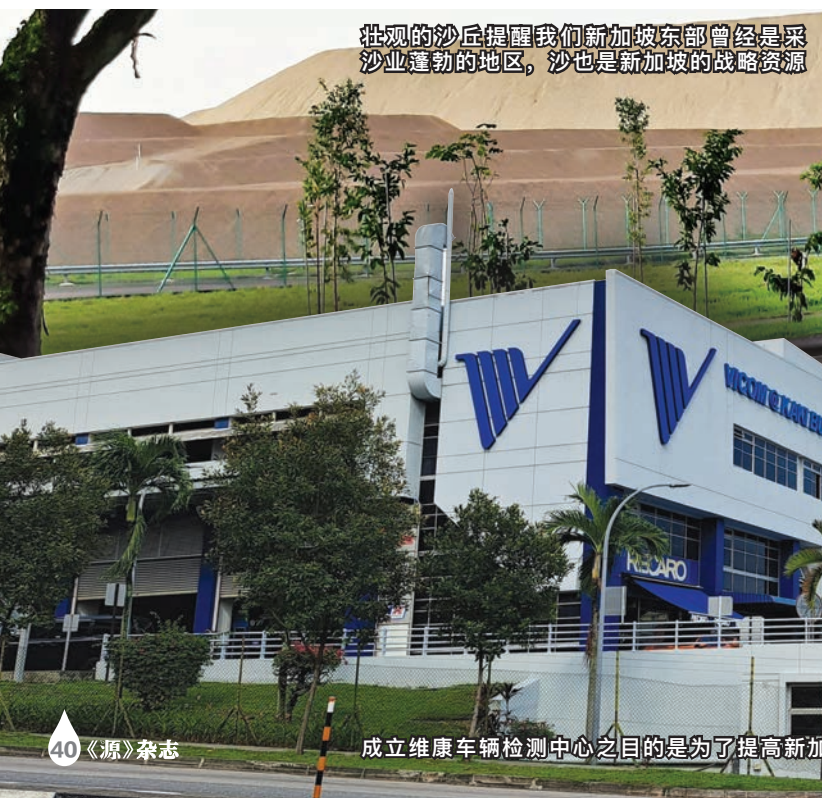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洁净水是新加坡的战略资源，不过“水源传奇”是被逼出来的。20世纪初新加坡已落实备水池规划，每天从长堤50公里外的布莱山（Gunung Pulai）集水区，输送淡水到珍珠山备水池。二战期间，英军从新山撤退，炸毁两小段新柔长堤来延缓日军攻势，长堤上的水管也被部分炸毁，使到市区水供不足，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迅速把水管修复。二战后用水量激增，长堤更换大水管，水供总算稳定下来。

新加坡建国时期跟马来西亚签订两份水供协议，第一份已经结束，第二份2061年才到期。一些马来西亚政客经常以关掉水龙头来威胁新加坡，促使我们通过收集雨水，制造新生水和淡化海水等来扭转乾坤。今天全岛共开辟了17个蓄水池，1985年由沙塘改建的勿洛蓄水池是其中一个。

宏观层面上，勿洛新生水厂投入运作，回收的污水源源不绝，经过处理后就像蒸馏水般纯净，部分用来支持晶片生产、电子业与发电厂等主要工业，其余的则注入蓄水池。新生水和淡化后的海水提供超过一半的洁净水源。柔佛的河流干旱时，甚至从新加坡输入新生水来解决燃眉之急。

旷野风情的沙山与矿湖

沙是新加坡另一重要战略资源，勿洛蓄水池



和风光旖旎的矿湖，就是昔日的采沙场遗迹。如果您厌倦了城市的高楼和花哨的度假胜地，不妨走入充满原始野性的矿湖。这里仿佛是北欧自然风光；矿湖旁壮观的沙丘，不妨想象置身于鸣沙山或大沙漠。这般场景或许让人感觉不真实，但沙子是实用之物，提醒我们新加坡东部曾经拥有过20年采沙的风光岁月，用来填海兴建樟宜机场和广厦千万间。

自古以来，列强不惜东征西讨或殖民来扩充领土。对新加坡而言，增加土地的方式则是文明的填海作业。自1822年开展第一项填海工程，建造莱佛士坊以来，本岛的土地面积已增加四成。历来的填土材料不是从内陆山丘挖掘出来的土壤，就是来自周围海床和东部老冲积层平原区的沙子。1980年代中期，这些资源开始枯竭或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采沙业告一段落，转向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买沙。根据联合国2019年的报告，新加坡是最大的海沙进口国之一，过去20年进口5亿吨海沙。

本世纪初，印尼暂时禁止向新加坡出口海沙，数年后以打击非法走私为由，再次禁止海沙出口。这时候滨海湾金沙和圣淘沙名胜世界两个综合度假胜地正处于建造高峰期，工程就是靠加基武吉囤积的沙丘来完成的。

印尼停止输出海沙后，马来西亚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海沙供应国，此外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印度等都成为新的来源地。新加坡对进口沙子的需求不可能中止，例如大士港的填海面积相当于380多个足球场，未来的东海岸人造长岛计划都要用到大量海沙。成熟的工业技术可节省海沙的用量，例如荷兰发明的“空注法”（Empoldering），简单地说就是围海造田。先在需要填海的区域周围建造海墙，然后将海水抽干，可省下四成沙量，德光岛的填海工程已率先采用。

为社会注入暖流的内政群英

坐落在勿洛蓄水池旁的内政团队战备人员协会，为会员提供轻松写意的傍水体验，也是对战备人员的肯定。内政团队组织庞大，包括警察部队、民防部队、移民与关卡局、监狱署、中央肃

加基武吉地形图
(根据2024年谷歌地图绘制)

- | | |
|---------------|-----------------|
| 1. 矿湖 | 7. 监狱学校 (已拆除) |
| 2. 沙丘 | 8. 加基武吉科技园 |
| 3. 勿洛蓄水池 | 9. 惹兰友诺士备水池 |
| 4. 内政团队战备人员协会 | 10. 维康车辆检测中心 |
| 5. 加基武吉民众俱乐部 | 11. 加基武吉工业园 |
| 6. 阿卡夫回教堂 | 12. 甘榜马来由 (已消失) |



毒局、平民和专职人员、内政科技局、赌场管理局和黄丝带新加坡。我们觉得新加坡安全，社会秩序稳定，内政团队居功至伟。

不远处加基武吉5道（Kaki Bukit Avenue 5）的丛林，曾经是加基武吉中心监狱学校（Kaki Bukit Centre Prison School）所在地，让更多囚犯继续读书，实现“学校第一，监狱第二”（School First, Prison Second）的改造理念。时任监狱署蔡志杰总监将监狱官和监狱里的工作人员称为“导航者”（Captains of Lives），开启21世纪监狱转型之旅，引导罪犯改过自新后重新融入社会。如今监狱学校已迁移至丹娜美拉。

早在建国年代，本地监狱已将教育定位为让囚犯重返社会的重要元素之一。如今监狱学校开办的中学与高中学术课程，每年招收400多名各年龄层学生。几年前监狱学校、义安理工学院和新加坡社科大学合作，让囚犯修读物流管理相关的专业课程，并获得黄丝带计划和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资助。至于对学术兴趣不大的囚犯，亦可获得技能培训，例如嗜毒人士可加入中途之家，接受道德与职业辅导，为融入社会做好准备。

维护公路安全的维康（VICOM）

居住在东部的拥车人士，对于加基武吉4道（Kaki Bukit Avenue 4）的维康车辆检测中心（VICOM）不会感到陌生。本地注册的车子

必须定期开入检测中心，领取安全证书后才能更新路税，继续上路行驶。维康自1981年成立以来，已为超过1000万辆车次进行检测。

维康见证新加坡公路网扩张和汽车工业改革的历程。维康初成立的时候，公路上只有16万辆车子。如今在路上奔驰的车子为昔日的3.5倍，9所车检中心分布在全岛各处。百多年来汽车都使用燃油机驱动，21世纪初试验天然气一段短时期，如今正在推广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

本地的全电动汽车处于试验阶段，无法普及的原因是价格昂贵，电池技术与设施未臻成熟，国人又喜欢开车到马来西亚旅游，对于充电续航便利与否有所顾忌。日本正在试行氢能汽车，洁净能源驱动车的多元化走向值得拭目以待。相信加基武吉从单元性部落走向现代的历程，足以让我们吸取思考规划的精髓，面向绿色未来。

参考文献：

- [1] Adlina Maulod, "Mohamed Eunos bin Abdullah",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201_2010-05-03.html accessed 31 December 2023.
- [2] Lim Tin Seng, "Four Taps: The Story of Singapore Water", biblioasia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https://biblioasia.nlb.gov.sg/vol-14/issue-1/apr-jun-2018/four-taps-sg-water/> accessed 31 December 2023.
- [3] Lim Tin Seng, "Land from Sand: Singapore's Reclamation Story", biblioasia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https://biblioasia.nlb.gov.sg/vol-13/issue-1/apr-jun-2017/land-from-sand/> accessed 31 December 2023.
- [4] Singapore Prison Service Heritage Gallery visited 29 August 2023.
- [5] The Straits Times.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Kaki Bukit, where sand, water and urbanisation meet

Although Kaki Bukit is less legendary than some other housing estates, each piece of land has its own unique story about its origins.

About a century ago, Kaki Bukit was a Malay settlement originally named Kampung Melayu.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Kaki Bukit transformed into a community of 30,000 residents of all races. With Bedok North and Kaki Bukit MRT stations on the Downtown MRT Line, older residents finally enjoyed the ideal of a liveable city.

While most HDB towns only have one or two light industrial estates, Kaki Bukit has seven industrial parks, technology parks and centre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majority of tenants ar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mainly from the automotive services and related industries. It is expected that after the relocation of Paya Lebar Air Force Base in 2030 with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s to be eased, a new round of changes will be inevitable.

Kaki Bukit means "foot of the hill" in Malay, although the hill was levelled a century ago and the soil was used to reclaim land on the east coast. In the late 1920s, Muhammad Eunos bin Abdullah convinced the residents living at the Kallang Basin vicinity to move to the foot of the hill. Inspired by the urbanisation of Kuala Lumpur, Eunos suggested that Malays should live together to preserve the essence of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e a sense of nationalism. The use of the collective term "Malay" to refer to local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Malay Archipelago was new at that time and sparked heated debate.

While "tribal identity" can be a powerful force for community cohesion, it can also be counterproductive if it was not handled appropriately. In the 1980s, the government redeveloped the area and turned the Malay village into a multi-ethnic residential area. The kampung children who grew up there became the first-generation residents of Kaki Bukit HDB estate.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place in a Malay kampung is the prayer hall. The Alkaff family built the Alkaff Mosque for the residents. 60 years later, the mosque was relocated to the junction of Kaki Bukit Road 4 and Bedok Reservoir Road. It was renamed Masjid Alkaff Kampung Melayu, one of the few mosques which offers religious class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Jalan Eunos Service Reservoir located along Kaki Bukit Avenue 4 was built in the 1950s to improve water supply to the Geylang, Katong and Changi areas. More than a decade later, the service reservoir was expanded to cope with the population boom in the east. Water from Bedok Reservoir is treated at the Bedok Water Treatment Plant and stored in this service reservoir before being distributed to all households.

Back to the separation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While the last water supply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as active until 2061, some Malaysian politicians have often threatened to cut off the water supply. To be more self-sufficien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d created more catchment areas. Today there are 17 reservoirs across the island including Bedok Reservoir.

Sand is another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 for Singapore. Bedok Reservoir and the picturesque Quarry Lake are the remains of the former sand quarries. You might want to explore the Quarry Lake which resembles Nordic natural landscapes. Besides the lake are spectacular sand dunes, reminding us that eastern Singapore once prospered through 20 years of sand mining.

Just when the two integrated resorts, Marina Bay Sands and Sentosa, were at the peak of construction, there was a disruption in the supply of sand from Indonesia. Sand stockpile in Kaki Bukit became handy. Indeed, Singapore's demand for imported sand is unlikely to stop. For example, the reclamation area of Tuas mega port is equivalent to more than 380 football fields. The future East Coast man-made 'Long Island' project will also require a large amount of sea sand. While expanding supply sources is ongoing, leveraging technology such as "empoldering" helps to manage land reclamation more efficiently.



从时代语境多模态演化 测新加坡华族文化风向

文·蔡志礼

前言

从朝不保夕挨饿受冻的蛮荒部落，进化到现代文明繁华大都会，人类文化在历史长河的波涛里浮沉翻转，一直都在不同时代语境的碰撞磨合中自我更新，在多模态的融合里演化生成。若要洞察某个族群某种文化现阶段最真实的状况，我们就务必须根据其流动的脉络和起伏的规律，进行周详调研与精准描述，否则就很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判，或者持续重播早已过时的刻板印象。此乃本文探讨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视角，也是笔者的自我要求，更是笔者对此课题抛砖引玉的殷切期望。

新华群演化超群

平心而论，新加坡至今的发展委实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国土小人口少，资源又如此匮乏的一个小岛国，竟然能在不超过一代人这么短的时间内，缔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甚至是在某种文化意义上，可称得上是种族与宗教百花齐放的和谐神话。

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组成来看，虽说新加坡常强调自己在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但若与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上述的多元特点，新加坡比中国少得可怜。单是民族种类，中国起码有五十六个，新加坡顶多四五个。关键是在新

加坡这个只有733.2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居然承载了592万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8058人。走在新加坡的乌节路上，马来和印度同胞迎面走来，实属司空见惯。但要在中国北京王府井大街，或是上海淮海路上，碰见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壮族迎面走来，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那为什么上述新加坡社会的多元特点，公认比中国还要突显呢？原因正是因为新加坡活动空间狭小，不同族群每天的接触机率大，来自各方语言文化的碰撞机会特多。一个多世纪来，无论是在隶属英国殖民地时期，或是新马分家前后，新加坡华族的文化都是在不同时代语境的多模态中，不断地演化生成的成品。例如中西文化的风险对冲；英语、华语和马来语以及华族方言的掺杂混用；南洋蕉风椰雨的洗刷濡染；官方语言政策的左右、市场经济潮起潮落的波动、来自中国新移民的逐年涌入；还有新近以华语文为媒介的人工智能的异军突起等，上述因素都直接与间接地影响了新加坡华族的语言风向与文化生态。

在当下几个大国之间惊涛拍岸的激烈博弈中，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大洗牌，对与世界经济纽带紧密衔接的新加坡而言，影响之大不在话下。在国际政论上享有崇高声誉，曾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院士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教授，在这个范畴有令人惊叹的精辟剖析，在此就不赘述。若有兴趣全面与深入的了解，请参阅他的《亚洲人会思考吗？》《走出纯真年代》《新亚洲半球》《新加坡能生存下去吗？》《东盟奇迹》，以及最新著作《中国赢了吗？》等书籍。

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华族虽然人口总量不算多，新加坡统计局去年的数据显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407万，其中华族人数301.8万，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74.1%。但是当我们尝试从各种角度切入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基因，例如华文水平、讲祖籍方言能力、文化认同取向、教育源流背景、宗教派别信仰、籍贯习俗和文化价值观的奉行等方面进行剖析时，就会发现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审视，新加坡华族都不是一个静态且单

一的族群。百年移民沧桑史和半个多世纪建国历程留下的痕迹证实了，新加坡华族的日常语言、人生价值观与文化认同感，不但多种多样而且始终处于一种持续动态演化的模式。

语言滑落文化落

郭振羽教授应《源》杂志谭瑞荣总编辑的邀请，在2023年12月出版的第6期（总期166），首度推出的“新华文化”专题栏目，发表的专文《寻找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语重心长地指出：

新加坡独立到今年58年，在一个历史长河里面太短了。只能靠点点滴滴的努力，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孕育出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目前我们更关心的应该是当今华语华文水平的低落，当务之急是如何推动保留文化之根。

身为一名生于斯长于斯，长期观察与研究新加坡华人语言文化动向，并以《新加坡华语的形成》完成社会应用语言学博士论文研究的新加坡华裔，我对郭教授的这番真知灼见，深感佩服。虽经官方与民间不断努力抢救，但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华语文水平始终提不上来的困境，令关心中华语言文化盛衰的人士坐困愁城，忧心忡忡。过去随着华语文水平和使用率的下滑，中华文化在岛国式微成了无可幸免的下场，恶性循环的结果加上西风的吹袭和日韩雨水的浇淋，中华语言文化在新加坡的颓势，任谁也无能力挽狂澜于既倒。

端正心态观事态

我曾在《惊涛拍岸声中乘风破浪——新加坡华文教学导航的几点省思》一文中，提出本地华语文水平低落的症结在于偏颇的观念与心态：

很多本地的孩子，自小就在西方文化的摇篮里长大，嘴里唱的儿歌童谣是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眼睛看的是童书里的白雪公主，稍长后吃的是麦当劳快餐，啃的是美国某一个州的家乡鸡，向往的是到迪斯尼乐园游玩，着迷的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如此长期耳濡目染之下日久生情，怎么可能不对与英语相关的事物产生好感，怎么可能不对西方文化产生根深蒂固的

归属感和对英语文的认同感？……若是对中华语言文化持有偏见的看法一日不改，本地的华文学子就注定要面对重重障碍。这种现象就与当年很多聪慧的华校生，因为对西方文化和英文的反感，最终没能很好地掌握英文一样，历史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只是语言、场景和当事人对换了。

在政治上，新加坡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无论是两三百年前或是近三四十年的华族新移民，是或非新加坡国籍华族，祖辈和故乡都源自中国，血浓于水，其语言、价值观和生活习俗，都是积累数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华文化的分支，流淌着华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血脉，继承了中华语言文化的基因。只因为在赤道边缘长期曝露在欧美雨水、日光和韩风的结果，部分遗传基因产生突变，思想行为自然也有所变异。然而，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与多模态信息源的迅速更替，新加坡华族的文化风向显然已开始转变，岛国的语言文化生态又进入了新一轮演化的过程。以下让我们从中国的崛起、新移民的涌入、华语文社媒的盛行和华文人工智能的异军突起等方面加以论述。

百年积弱国力弱

历史是一面望后镜，不往后看难以向前走。两百多年前的晚清羸弱不堪，神州大地动荡不安，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虎视眈眈，接着就是趁虚而入，大举进犯。古老封闭的城墙在坚船利炮咆哮中应声倒塌，鸦片战争掀开了近代中国最惨痛的屈辱史，原本稳如泰山的千年古国文化根基，在惊涛骇浪声中显得踉踉跄跄。1911年的辛亥革命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借机点燃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导火线，又给百废待兴的中国毁灭式沉重的打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才从废墟里站了起来。1978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策框架，让中国从此踏上现代化征程。然而，百年积弱所蒙受的极大精神屈辱和难以估量的物质损失，让很多华族失去了民族自尊与信心，东方的月亮不但不圆，还残缺不全。所

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不断有人唱衰“东风无力百花残”的中国，在接下来的七八十年内都难成气候，甚至于说中国可能从此衰败沦落，一蹶不振。欲振乏力的中华语言文化在世人（包括部分中国人和新加坡人）眼中，自然就没有什么文化与经济价值可言了。

中国崛起华文起

而今奋发图强的中国，不但已崛起成为有底气有勇气与美国抗衡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益壮大的国势也大大提升了中华语言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中华文化储备了千年的软文化能量，也随着无远弗届的网络神经线在全球爆发，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这对长期处于搁浅在南洋沙滩上的新加坡华族文化小舟，无疑是枯木逢春、水涨船高的助力。随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新移民的陆续涌入，特别是学有专长人才的空降，新加坡社会以英语为主的语言风向，已经在线上线下更大的社交层面上，产生显著的变化。十多年前南洋理工大学曾因为校园里讲华语的现象太普遍引起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早期，一般来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英语能力弱，要融入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环境委实不易，所以多选择与华文相关的行业，例如教育水平高的可选择当华文老师。近十多年来，中国新移民的英语都普遍提高了好几级，有一些还是学习英语专业的，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比很多新加坡人还高。但即便如此，虽然有些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在日常说华语时，会经意或不经意地夹杂几个英语单词或句式，有时还会冒出一些很传神的本地方言词语。这是语言学界归类为“入乡随俗”的语言现象，无可厚非。绝大多数中国新移民的家庭用语，还是完好地保留了规范的华语和传统价值观，这正呼应了郭教授“保留文化之根”的期许。

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也见证了华语文随着中国营运的跨国电商，通过全球互联网如爬藤般翻墙延伸到家家户户的电脑荧光屏以及手机的屏幕上。若是看不懂华文说明，就无法抢先购得又便宜又好的中国物品，已成了网民心照不宣的潜规

则。各类以华文华语为本位的社交媒体，例如最近因美国听证会而声名大噪的抖音，还有越来越红的小红书等。很多大受欢迎的外籍网红和明星歌手，虽然来不及学习华语，但无论如何都会想方设法亡羊补牢，例如特别在节目中打上了斗大的华文字幕，确保吸引和留住不谙外语的华语观众（客户）。

前些时候，我教过的一些新加坡电脑系高材生透露，大学毕业后到新加坡投资设立研发中心与营运总部的中国科技大企业求职，面试时以英语沟通轻松过关，但一开始上班时却发现与中国总部的沟通，需要有一定的华语文能力，否则难以胜任愉快，还有些似懂非懂的华文文件档案要处理，结局是只好知难而退，忍痛失去了一份高薪金待遇的工作。教育界也敏锐地察觉到各界对华语文的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几乎所有在新加坡的国际学校，都纷纷开办中华语言文化课程，有些甚至将之列为必修科，足见其对华语文的重视程度。看来掌握英语文好处多，没学好华语文坏处也不少！眼前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明确地告示世人，从殖民地时期至今，西方铺天盖地的影响力仍在，但新加坡华族的语言生态、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感，正在随着华语文经济价值的后市看起，经历一场任谁也拦不住的大举东迁趋势。

人工智能中华能

2022年11月，OpenAI公司的ChatGPT横空出世，令世人震惊于人工智能发展之神速，也加速催生了人工智能革命时代的降临。人工智能的能力，从之前的“感应”提升到如今的“感知”，接下来提升的层次将会是超级人工智能，有意识、有感情的“感怀”。

这一回华语文不像之前面对网络革命时，一开跑就远远地被遗弃在后头，费了好大的劲儿和好长的时间，才气吁吁地追上来。当前中国科技的进展已不可同日而语，太空站、无人机和自动驾驶的先进暂且不谈，自2020年后，语言大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视觉和多模态等技术分支上都直追美国，涌现了如科大讯飞的星火认知、华为的盘古、百度的文心一言等，一批具规模的预练大模型，形成了全球华文前沿的大模

型技术群。从现阶段华文人工智能进展的势头判断，以中华语文为媒介，以中华文化为内容的超级语言大模型的面世，在全球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努力下，指日可待。今年2月4日，新加坡作家协会就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与领飞科技公司、人工智能语言教育协会，签署了建构新华作家作品大模型的合作协议，让新加坡华文文学搭上了飞速向前的人工智能高铁。

除了当下让很多人见识后都啧啧称奇，能迅速生成华语文稿和中华琴棋书画作品的能耐外，华文人工智能已能进一步通过扫描辨识，精准地阅读与理解华文内容，甚至于审阅与批改作文，纠正错字、改正语法错误，还能建议如何提高文本质量，然后再打分和写评语等，几乎无所不能。实验证实其精准度很多时候都超越人类语文考官。

有些人在惊叹之余，就下了语言文字水平和艺术创作力越来越不重要的结论。既然人工智能都能在瞬间按照要求撰写文章，甚至于是产生惊人惊艳的诗词曲赋，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劳神费心磨炼文笔？既然人工智能在几分钟之内，完成数万字的外文翻译，那我们还需要煞费苦心学习外语吗？既然人工智能可按照提示，在几秒钟内绘出10幅我们心目中的画像，那我们还要耗时费力学画画吗？

表面上看来，以上的质问都似乎言之有理，但是只要往深一层想，很快就发现纯属似是而非的草率推断。过去人工智能在运作前，必定需要专业程序员编写代码，当下只需以人类的自然语言提供提示语即可。试问若是认知不足，学识匮乏，语言水平低，书写能力弱，如何写出精准细致的提示语，要求人工智能书写出自己心目中的文稿？如何判断人工智能翻译的外语是否有误？又如何让人工智能快速生成理想的绘画作品？人工智能科学界承认，在可预见的未来，再强大的人工智能也无法拥有人类修炼千年的艺术灵性，再先进的科技仍然无法酝酿繁衍出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无论是亲自撰写，还是靠人工智能的辅助，要在作品里展现可贵人文精神，最终还是得靠人文素养的底蕴。

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真正在新华

语言生态湖里掀起波澜，产生重大变化的关键因素，是人工智能机器人不但说得一口流利标准且感情丰富的华语，还听得懂人类的自然语言，几乎可以与我们以英语和华语，甚至于其他欧洲语言和某些中国方言，无障碍地对话沟通。关键是不只是量变，还上升到质变的层次。这不但为华语文的学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维度的语境空间，感受到了中华语言文化的魅力，进而提高了学习华语文的兴趣，也提升了华语文在国际上和新加坡社会上的形象和地位。华语文成为与英语并驾齐驱的国际通用语，已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了。

千载难逢今日逢

郭教授专文的总结精辟独到，他说：

新加坡华族文化先天存在的“双重性格”，兼有源自原乡华族文化的共性，以及作为“新土”的新加坡文化的特性，也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宝贵的资产。出现于“新土”的文化创新，也已成为

文化中华的一部分，可以丰富其文化内涵。

对郭教授的高见我深表赞同。如果学贯中西又在东南亚蕉风椰雨中成长起来的新加坡华族精英，能在继承中华文明坚实的基础上添加南洋色彩，去芜存菁之余西学中用，适度地引入西方之长，补东方之短，以聚集资源提炼适用于岛国的中华语言文化精华。接着探讨如何借助人工智能保留、传承与弘扬本地华族文化，例如把新加坡华族文化各方面成就的关键讯息，有序地输入语言大模型，逐步汇聚成展现新加坡华族文化特色的大数据库。在维护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与全人类各大文明进行高效互动，进一步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让全球更多人认识、肯定与赞赏我们宝贵的资产。这必将是新加坡华族可以光荣载入人类文明史册的划时代壮举。

一向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为新加坡谋福祉的新加坡华社，又怎能错过这个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呢？

作者简介

新加坡第三代华人，新加坡国立大学高才双语教育硕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言暨文学博士。曾在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任教16年，担任博士生导师与主管教育科技的人文学院助理院长，长期从事语言文化与教育科技研究以及师资培训工作。曾任国家文化奖文学专家评审团主席、文化奖得主作品翻译系列顾问、南方大学学院副教授兼艺术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

现任当代艺术研究会会长、五月诗社社长、人工智能语言教育协会会长、领飞科技首席人工智能应用语言学家、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写作组组长、全国驻校作家项目主持、5G文学网和校园网总监、《艺术研究》双语期刊总编辑。

多次在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包括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举行的全球华语教学研讨会。发表语言文化与教育科技论文60余篇，文学创作数百篇，编著书籍30余本，包括中英文版《学语致用：李光耀华语学习心得》。2021年获颁“东南亚文学奖”，属于少数游走于语言文化和教育科技疆域的学者。



活跃在中文国际教育舞台的

新加坡学者 吴英成



文图·汪惠迪

14世纪中叶，中国福建等沿海省份就有百姓下南洋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福建广东两省因“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者便大批过番南洋。1876至1898二十余年间，仅从厦门和汕头两地漂洋过海移居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就有285万之多。

1819年1月29日，英国人莱佛士进占新加坡，其时岛上已有少量华人。

1838年，新加坡义塾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s）创立，成为新加坡教育史上空前绝后，唯一包容现今新加坡四种官方语文于同一屋檐下的学校，而早在1832年，有位“马典娘娘”（苏菲亚·马典，Sophia Martin）就出了本女性启蒙读物《训女三字经》，成为新加坡教育史上别开生面的一份重要文献。^[1]

如果从1838年的义塾书院创立算起，新加坡华校已有185年历史了。至于华校的数目，自新加坡开埠至1942年被日本占领的120年间，“有名可考”者共有308所，遍布新加坡本岛及离岛。^[2]

所谓“华校”是指“以中文（最早是闽、潮、粤、客、琼等方言，后来则为国语或普通话）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并且在教导现代学科知识的同时，也侧重于对学生进行有关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知识的教授，以及华族的思想 and 价值观之灌输的学校”。^[3]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私塾蒙馆书院学堂随着社会的发展统称学校。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建国，甫建国，就推行双语教育，对华族子弟来说，就是“英语+华语”。英语是新加坡政府的行政用语，也是全国各族同胞相互沟通的共同语，华语则是新加坡华社的共同语。1987年全国学校源流统一，除母语课程外，其余课程一律以英语为教学语言。从此，“华校”



国家会议中心
CHINA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进入历史。

要是追本溯源，新加坡华人的“祖语”（heritage language）就是汉语——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记录汉语的文字是汉字。然而新加坡在独立建国的历程中，避“中”避“汉”，他们选用“华”字，于是出现了一系列以“华”字起头的词语，沿用至今，例如“华族”“华人”“华语”“华文”等等。对此，新加坡前辈学者卢绍昌先生解释说，“‘华语’是新加坡人创制的、土生土长的词儿”，华语“是新加坡或东南亚人称华族的共同语”，“‘华语’这个词儿的创制及应用在政治上的意义是伴同独立运动而来的，它表示与所来自的国家方面保持一定的距离，站稳自己的脚跟，走自己的路”。^[4]

从上面简要的历史回顾中，我们不难看到汉语国际教育或国际中文教育在新加坡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并且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总结这份宝贵的经验，并与今天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中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专家学者分享、交流或将之传授给有志于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莘莘学子，这个重任落在新加坡学者的肩上。

笔者看到，自2015年至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语言学暨语言教育教授吴英成先生先后应聘担任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的“外专”（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授予的外国专家身份）；担任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华侨大学、燕山大学、重庆交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吉林外国语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的客座教授。为了参会、研讨、讲学、访友，吴教授不辞辛劳，远涉重洋，从南中国海上的明珠新加坡，飞到神州大地，复从黄海之滨到青海湖畔，从南国五羊城到北国长白山，所到之处，受到中国研究机构和大专学府的领导、学者和研究生的普遍欢迎，为新中两国的交往在教育领域做出了突出而重要的贡献。

笔者看到，1997年11月27日，吴英成教授以“特邀海外讲席”身份出席在苏州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汉字研讨会”，并做学术报告。从此以后，直到2024年1月，他在国内和海外，主要是中国，共做了138场学术报告，其中“主题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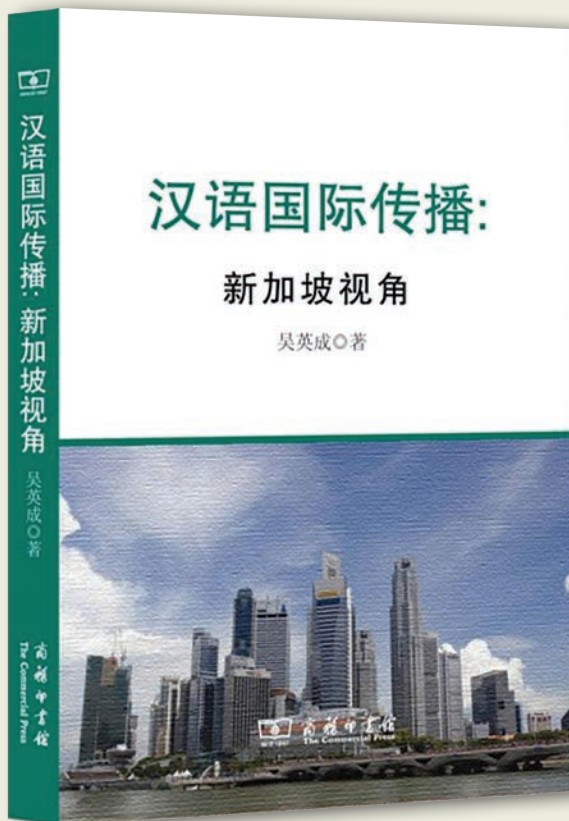
讲”63场，“特邀海外专题演讲”69场，余为会议致辞等。笔者保存着一份清单，一一记录了这138场演讲的时间、地点和讲题。

笔者看到，从1998年到2020的22年间，吴教授指导五名学生完成博士论文，五名学生完成文学硕士与教育硕士论文，八名学生完成文学士荣誉学位论文。

笔者看到，吴英成教授出版专著六种，其中最重要的是《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5]和Teach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 Singapore Perspective。^[6]

从1985年10月19日至2023年9月14日，吴英成教授在新加坡和海外报刊上共发表中英文论文等163篇。笔者保存着一份记录这些著作和论文出版或发表的时间和出处的清单。

笔者看到，吴英成教授除任职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外，还受聘兼任本国及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和港澳特区）、日本、美国、南非、马来西亚、印尼等公私机构的理事、课程校外评



《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

委、学术顾问、学术委员会委员、编审顾问或高级学位考试委员等职务。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汉语教学、全球汉语与汉语变体、汉英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汉英对比与翻译、华裔语言形态与身份认同、教学科技应用、教育组织管理，曾开设过的课程有汉语语言学导论、汉语音韵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汉语修辞学、社会语言学、中英对比分析、双语并用华语教学法、华语教学导论、词汇语法教学、阅读教学、作文教学、语言技能教学等26门。

最引人瞩目的是，2023年12月7日至9日，世界中文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外160多个国家的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和国际语言文化机构的负责人、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专家学者等约2000人赴会，期间同时举办十多场国际论坛和展览，堪称一场创新的国际中文教育盛会。

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国际中文国际教育基金会、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承办。大会的主题是“中文服务世界，开放引领未来”。吴英成教授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在8日上午，做了题为《中国汉语至国际中文：新时代百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的报告。

吴英成教授的发言站位很高，构建了新时代、新形势下国际中文教育的新格局。他在分析中文作为全球通用语的成因时，引述英国著名语言教育家克里斯特尔（Crystal 1997:7）的话指出：

一个国家的语言是否成为全球语言，与该语言内在的结构性质、词汇量大小、是否曾为伟大文学作品的书写工具、是否曾与伟大的文化或宗教联结无紧密关联，也与该语言本族语使用者人数的多寡无必然关联。

那么，促成中文成为全球通用语的条件什么呢？吴英成认为：

促成中文成为全球通用语不取决于中文本身和中国文化以及说中文为本族语人数多寡，而取决于中文背后的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非语言因素。

并进而指出：

外国留学生到中国积极学习中文，并不是要

成为中国人，而是着眼于中国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科技等发展潜能，希望能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使者。

论及中文国际化的竞争对象，人所共知是英文，然而中文的国际传播路径却与英文完全不同。吴英成认为，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致力于向外国人推广汉语与传播中国文化，教学内容多半侧重汉语本体与中国文化教学，这与基于二语学习者基底语的“老外教汉语”，譬如“语”和“文”分轨处理的模式大相径庭。倘若国际汉语教学界无法从外语学习者的角度出发，中文国际化推进的速度必然延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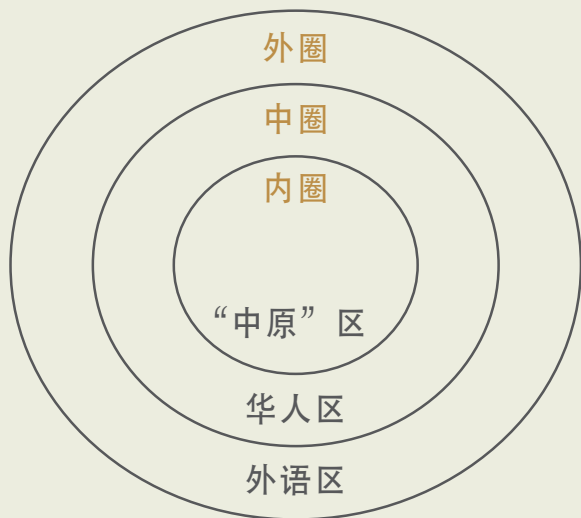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国内国际双循环”等大政方针的部署、推进与落实，中国的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际秩序相应调整。在新的国际格局下，继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之后，中国境内的汉人汉语已扩展至大中华地区的华人华语，目前正逐步成为在世界各地普及通用的国际中文。汉人汉语→华人华语→国际中文，中文国际传播与中国复兴同步，靠的是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这样的形势下教外国人汉语，就必须满足当地对华贸易需求。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需要专业领域的人才，因此国际中文教育不仅必须训练学生掌握日常生活用语的沟通技能，还必须开设对华专业或行业中文课程，依据金融、科技、交通、运输等不同领域设计相应的课程，而国际中文教材亦应随之尽速朝本土化、语别化、国别化、族别化的方向前进。因此本土化教材的研发，语言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下一阶段亟需关注的重点领域。

“老外教汉语”，“语”和“文”应分轨处理；“老外教汉语”，应与以中国为导向的教育经验有所不同；“老外教汉语”，教材应本土化、语别化、国别化、族别化。这位“老外”就是吴英成，长相跟中国人一样，但他是新加坡人，是如假包换的“老外”。中国有句俗话说叫“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认为会不会念经还得看他念的是什么经。我认吴英成是会念经的“外来和尚”，他念的是“真经”。

1998年12月8日，《联合早报》副刊发表

了吴英成博士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找出新加坡在全球华语圈的立足点》。新加坡的立足点是找到了，但全球其他华语社区的立足点在哪儿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改写了论文，题目是《全球华语的崛起与挑战》。这篇论文先是在于2000年6月15日至18日在中国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主办的“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发表在2003年2月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语文建设通讯（香港）》总第73期上，全文8500字。这篇论文点击率很高，引用次数很多，影响较大。吴英成教授引介克里斯特尔的观点，认为全球中文可用下面的“三大同心圈”来说明。^[7]



内圈（中原区）以中文作为第一语言或全国共同语。

中圈（华人区）以中文作为共通语的华人区，将中文称为“华语”，其特点是在多语社会中，华语成为华人族群的标志及日常通用语之一。

外圈（外语区）以中文作为外语的非汉人地区，其范围包括世界各地外籍人士。

吴英成教授写的《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是他20年学术历程的回顾，是一本阐述汉语国际化进程及影响的学术专著。新加坡前外交部部长杨荣文先生，中国教育部语信司前司长李宇明教授和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魏久安教授为这本书作序。

杨荣文先生说：“新加坡复杂的语言景观是建国以来国家、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各地也面对类似的冲击。由于交通和通讯日益便捷，不同的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混用。正因如此，新加坡的语言教学经验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兴趣。吴英成的新书《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的出版，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李宇明教授说：“在制订汉语国际传播规划时，学界的慧眼又投注到南洋。南洋华语是汉语国际传播的历史先遣队，从这支先遣队身上，语言规划者会获得何种启迪？在当今汉语全球化的进程中，怎样定位南洋华语？南洋又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带着这些问号拜读英成先生这部大著时，许多问号竟伸展为感叹号了！”

魏久安教授在美国从事汉语教学二十余年，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说：“新加坡的汉语教学独树一帜。虽然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红点，新加坡的经验却值得所有人学习。汉语教学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类似英语教学，英成书中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也显得越发重要。无论身处中国、北美还是欧洲的汉语教学界，关注新加坡的经验总能使我们获益良多。”

在我心目中，吴英成教授是一位博学多才、善于思考、不务空名、勤恳治学的学者，他是新加坡的骄傲。

注释：

- [1] 庄永康，《文史工作永不寂寞》，2007年9月2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言论版。
- [2]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第418页，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年11月。
- [3]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第416页，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年11月。
- [4] 卢绍昌，《华语论集》第46-47页，1984年，新加坡。
- [5] 商务印书馆出版，326页，2010年1月第1版，北京。
- [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212pp.
- [7] 克里斯特尔的论述详参Crystal, D (1997).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郑佳美（2000）《英语帝国》，台北：猫头鹰出版社。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落地生根的郁金香

孙宽双语诗集意象



月亮与郁金香

The Moon and Tulips

孙宽著



文图·庄永康

为

《源》杂志采访孙宽，缘于今年2月24日在书城友联书局举行的中英双语诗集《月亮与郁金香》（澳洲先驱出版社）的发布座谈。3月初，我在单独采访时向这位诗人兼画家言明：篇幅有限，拙文主题须围绕她——作为本地一名新移民，如何以诗与画表达一个“落地生根”的过程与心境。

“对，这个话题也很适合《源》。”孙宽同意了。

孙宽在她的“宽余时光”系列第一本文集《遇见都是初恋》（2019年3月，赤道风出版社）中自我介绍：原名孙宽余，回族，新加坡公民，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祖籍北京。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曾在北京、香港、新加坡、美国、新西兰等地学习工作，做过播音主持，经过商，当

过老师……

1994年初到新加坡来，时年26岁。2014年开始在《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累积了一定的创作量，2016年创办自媒体微刊《宽余时光》，并于2019年开始了系列出版，频频得奖。孙宽说，一心想治愈抑郁症，是触发她创作的开始。

2020年3月4日，我蒙宽姐在出书第一时间，惠贻了一本高艺出版的诗集《双城恋》（宽余时光系列之二），并在近日的午餐采访中，再得隆情厚赠宽余时光系列全部力作（都装在以孙宽画作设计的手提袋中），包括之三的散文集《荒月之城》、之四的人文书写与小说集《冰火恋》与之五的诗画作品《郁金香的二十三种姿态》（此书是新著《月亮与郁金香》的

姊妹篇)。

是的，若用全部六本著作来综合，恐怕足以写成一本《孙宽评传》了。但显然，这并不是区区本文所能承载的容量。

在赤道岛国安了家

《落地生根》是在《双城恋》与新诗集中都出现过的同名诗。在前书中，落地生根像是一棵具象的植物：

我的心隐约地滤出一片小小的绿
脚趾缝，开始萌动，滋出嫩芽
脚底，负荷着，长出细细的根须

在《月亮与郁金香》中，《落地生根》是开篇第一诗，诗中吟诵的主题已幻化为抽象的各种颜色：蓝色，跳跃的火/朝霞的海；银子浪花；灵魂深处的紫；绿的弧线，暗影，阴凉；刮刀的背，划出一丝丝/淡黄色芬芳。

这些颜色，来自诗人画家精神上的意象——郁金香。孙宽说，郁金香是充满顽强生命力的“新移民”，它原本是亚洲西部高原上的一种小野花，能耐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可在极贫瘠的环境生存。1000多年前，土耳其人昵称这种花为tülbent，即波斯语的“穆斯林头巾”，16世纪奥地利皇帝一位大使把它带到西方。在欧洲，郁金香既是价值几幢豪宅的名花，也是骤然掉到谷底无人问津的贱草。然而，战胜了病毒的郁金香迄今已衍生出了8000多个品种，成为多国的国花。2021年，新加坡在滨海湾花园展出了本土培植生长的郁金香。如今，郁金香已在赤道岛国安了家。

新加坡：感恩遇见

回看友联书局座谈会定的主题，也是新移民在本地的落地生根。前来对谈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张森林博士（伍木），另一位是从陪读妈妈当上华文教师，再融入本地成为公民的游长樱女士。孙宽则是2011年在新加坡与来自英国的工程师马克结婚，次年宣誓入籍。她说自己并不是新加坡媳妇，而是迎来了新加坡女婿的本地公民。婚礼时她拿的花束是郁金香。

“世界美食的汇聚”、“出租车的气味”等本土元素，或许都只是归属感的表层。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孙宽从早年的“小龙女”（贬义的小三之意）歧视氛围中，在新加坡住了30年，而

认同它为到外地12天就会想回来的家？

在单独访问时，孙宽经过深沉的思考，认为归属感来自稳定的生活环境和高度法治。她本身便经历过一宗在别处绝对是无法平反的诬告案，在当局查证下水落石出，还她一个公道。孙宽的第一本文集《遇见都是初恋》，便曾把自己从出生到童年的遭遇，成长足迹，从落户到安居的新加坡生活，都交代得很清楚。来到新加坡，使她“感恩遇见，继续向前”。

南京的黄梵老师在序文中说：“这本书既可以看作孙宽的成长自传，也可以看作她过去与现在的隐性对比，还可以看作一个人在经历文化转变时，内心的挣扎、成蛹、破茧、化蝶之旅。”

书中《没有故乡的河流》一文说：“新加坡政府和居民平和地接受每个人的选择和自然状态”；“其实各类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能和谐共生共存却绝无仅有，这是周边任何国家所不能及的，这也和大一统文化的绝对排他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浏览孙宽的诗或文，甚至绘画，都不难发现她的落地生根之感。这种感觉与把新加坡当作是一块“跳板”的文学书写，有着明显的不同。新作《黄金海》：

……八千个品种，八千里云和路
你学会忍耐，像锤子一样凿进钉子
一颗一颗钉在活着，却不能说话的
心脏

言谈间感到孙宽的梦想，是她的文字作品有一天能转化为影视，为万众翘首。愚见以为，这个梦想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孙宽，这个生命体跌宕的幅度，够大了！亲生父亲曾是国民政府银行财务官，“除了读书和听父母讲故事，我最喜欢父亲教我数钱。”亲爹去世后继认的一位干爸，考虑更长远：“在我25岁时，他就开始给我灌输如何养老和退休的理念……”孙宽说着说着，令我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

题图说明：

友联发布会上的孙宽与自己的绘画和文学作品。
(右下为配合诗题的油画《落地生根》(左)和《黄金海》)

(作者为本地资深报人)

旧时代广帮总坟墓墓碑上的“寿”字纹饰



文图·庾潍诚

广惠肇碧山亭是广东籍贯广府、惠州和肇庆三属人士的坟场，位于汤申路上段的324亩（132公顷）土地上。1980年代初全部坟墓已迁移和清挖，改建为碧山镇住宅区用途。旧时碧山亭坟场埋葬了十万余个莹地，“总坟”也有291座之多。相对私坟，“总坟”是广帮各职业行会、会馆、社团书室、善堂佛堂、姓氏团体、地域宗亲等的义冢、公墓（集葬地），从清朝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下至公元1975为止，时间跨度足有一百四、五十年。

我在2023年重新搜集和整理这些40年前的碧山亭“总坟”黑白照片，总共找回285张。通观全部照片，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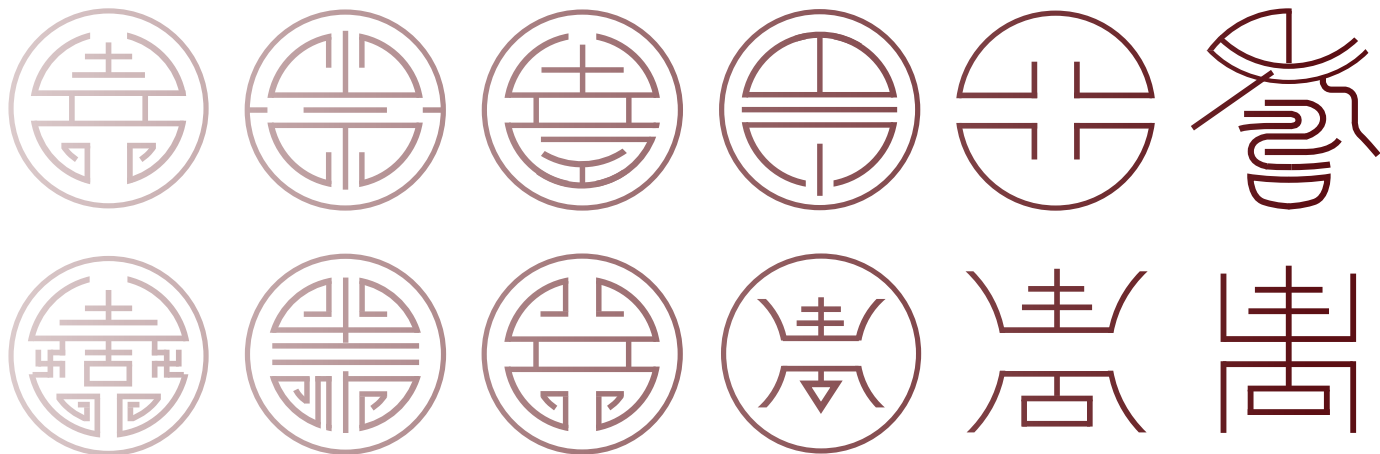
象：一，墓碑的碑帽上都会放上一些图饰，譬如蝙蝠（寓意居福）、铜钱（寓意钱财）、鹿（寓意禄），或是放上行会社团组织的称号等等；二，极大部分“总坟”的碑帽上都安置了一个“寿”字纹饰，造型或同或异。由于“寿”字纹饰屡见，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根据找回的这285张“总坟”黑白照片作了反复通读和研究后，我总结了以下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寿”字是哀思亡者之余，对生者的另一种祝福和寄托。旧时代碧山亭的“总坟”不是衣冠冢，更不是空冢。它是各职业行会、社团组织或姓氏团体的集葬墓。“总坟”是公家用来照顾那些无后嗣或较贫困家庭的合葬之地，也同样由公家出面操办和打理各种拜祭的身后事宜。虽说亡者已逝，但对活人来说最大的寄愿或追求不外这三者：寿（长寿）、财（钱财）、丁（后代蕃昌）。试举一对墓联文字：“吉地符祥龙矻水，佳城演瑞寿财丁”（金-6^[注]，定堂胡氏总坟墓，寿财丁又见9-77广肇胡氏联谊会总坟、9-78南洋胡氏总会大总坟），除此之外也有的墓联强调“发丁财”（3-21中山堂甄氏大总坟和9-80副总坟、金-1肇府七君子列公合葬之墓），又或“旺丁财”（7-16南海中村李氏先人总坟）。总而言之，活人哀思亡灵同时也更加寄望祖先（或先辈）亡灵能够护佑后人，让生者寿长、财富、丁



中山古镇同乡总坟（甲午年，公元1954）墓碑上的“寿”字纹饰（照片现藏碧山亭）



蕃。这三者当中，当然“寿”是最重要的，没寿没健康，一切白谈。因此，在“总坟”碑帽上就安放一个“寿”字图案，寓意哀思亡者的同时，更是对生者的另一种祝福和寄愿。

第二，“总坟”碑帽上的“寿”字纹饰沿续了中国传统的“寿”字百变造型艺术风格。华人向来喜欢“福禄寿”三个字，有福气、有功名富贵、兼又长寿，三者兼有是最理想的人生状态。中文字当中也是“福禄寿”这三字有百变的艺术造型，有百福图、百寿图又或百禄图，艺术造型琳琅满目。旧时碧山亭“总坟”墓碑上的“寿”字纹饰，也沿续了中国传统的“寿”字百变造型风格，图案纹理皆多近似。为此，我根据传世的黑白“总坟”照片，综合整理了墓碑上的各种“寿”字纹饰图案（见上图）。

第三，推断某些“不可识”图案也理应是“寿”字纹饰。在通读传世的旧时碧山亭285张“总坟”黑白照片过程中，我也曾遇到不可识读的图案：

这个图案反复出现在不同的“总坟”墓碑之上。我统计了一下有17张之多（占全部285张的6%）。但此图案文字似周非



周，似万却又非万。我认为这个图案跟其它“总坟”墓碑帽上的图饰一样，是“寿”字的艺术图饰的一种。如前面所所说，活人最大的寄愿追求不外“寿丁财”三种。如今这个图案反复出现在不同的“总坟”的墓碑帽上，说明它是大家的共同追求。结合其它数百个“总坟”的“寿”字图饰来看，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它极可能就是“寿”字艺术图饰的其中一种。同时它的纹路又比传统的“寿”字艺术字要简洁一些。

总的来说，根据碧山亭“总坟”照片看来，旧时代人们在立坟追思和安抚亡灵同时，也直接通过墓碑的文字图饰寄托表达了生者的祝愿和追求。旧时碧山亭“总坟”墓碑帽上屡屡可见的“寿”字图饰，就是生者祝愿和追求的具体表现之一。“寿”字图饰的应用，好比旧时代日常生活使用杯盘碗碟上面所绘“寿”字纹饰一样，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祝福。

注释：

金-6是编号，指旧时碧山亭坟场的金塔山、六号坟，余类推。

题图说明：

旧时代碧山亭“总坟”墓碑上的寿字纹饰（根据不同照片综合整理）

（作者为哲学博士、新加坡花县会馆副会长、广惠肇碧山亭监事、文物馆副主任）

知恩于心 感恩于行



知恩于心 感恩于行

宗乡总会与中华总商会联办“向李显龙资政致敬”千人宴



文·欧雅丽

图·编辑部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宗乡总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6月12日晚在新达城会展中心举办晚宴，向5月15日卸下总理重任的国务资政李显龙致敬，感谢他在过去20年主政期间，鞠躬尽瘁为国为民服务。当晚席开超过140桌，来自宗乡团体、商团，以及其他一些华社组织的代表逾1400人齐聚一堂。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副总理王瑞杰、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部长兼贸工部主管贸易关系部长傅海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国会议长谢健平、多名内阁部长和国会议员，以及李显龙夫人何晶也出席了这场晚宴。

主政20年 心系华社发展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在致辞时说，李显龙先生担任我国总理的20年间，新加坡遇到过挫

折，战胜了困难，把握住机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一个富有竞争力的体系。他站在宗乡总会的角度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李显龙先生对华社的贡献，分别是高瞻远瞩，全力推动华族文化的发展；为推广华文华语设立可持续的机制与动力；身体力行，鼓励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促进政府与民间的双向互动，委任精通双语的部长领导华社联络组。

蔡其生说：“在这种双向互动中，宗乡总会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成为华社和政府之间的纽带。我们将继续秉承这项使命，推动华族文化和宗乡会馆的传承与发展，为社会的多元融合、和谐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他表示宗乡总会与华社全体同仁将密切合作，支持黄循财总理和第四代领导团队，共同开创新加坡的美好未来。

中华总商会会长高泉庆也在致辞中盛赞李

资政从政40年公仆一生，鞠躬尽瘁，为新加坡的发展全力奉献。他指出李资政在担任总理期间积极带动华社发展，作为“老华校生”，他喜欢阅读华文报、爱听新谣歌曲，也担任多个华社团体的赞助人，对中华文化和新加坡华族文化有深厚的浸濡与认识。

高泉庆引用李资政在2013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提到的政府向企业唱的三首歌表达华社华商的心声。他说：“希望李资政将来有时间时，多回来华社走走看看，与华商谈谈未来发展，我们想让‘你知道我们在等你’，同时也想问：‘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们华社’？我们也不想告诉你我们会永远‘在你左右’，也希望你会常在我们左右，继续给予我们启示与指导。”

肯定华社贡献 强调新加坡华人独特身份认同

李显龙资政在晚宴上发表了一段长达13分钟的演讲。他多次肯定了本地华社对国家的贡献。他在任期内一直与华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政府与华社之间建立了互信和良好的基础，共同克服挑战，无论是当年全球金融危机或是近年的冠病疫情，华社都积极配合政府，一起渡过难关。在新加坡的历史进程中，华社始终是一个重要支柱，让新加坡可以从第三世界发展成第一世界国家。华社组织还是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的重要桥梁，商会和会馆积极接纳新移民，帮助他们入乡随俗，培养他们产生对本地华人独特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对促进我国的凝聚力非常重要。此外，华社组织对我国的文化发展贡献巨大。宗乡总会、各个会馆以及华文媒体，一直坚守着发扬和传承文化的使命，努力吸引年轻人加入他们的行列。经过多年的努力，如年轻一代对本地华人在多元种族社会的地位和角色，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也更积极发扬本地独特的华族文化。

李资政说：“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却保持多元种族、多元宗教，人人都平等的社会。我们没有因为华人居多就顺理成章完全以华族文化作为新加坡文化。新加坡华族文化是建立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里的，我们接受和尊重其他种族和文化，同时也不断

和各大种族互相交流。这是非常宝贵的，也是新加坡华人的特征之一。”他也强调，所有新加坡人都应该以新加坡的利益为首要考量。虽然新加坡华人跟其他各地华人属于同个种族，一些华人也觉得大家都是龙的传人，不过要必须牢记，自己首先是新加坡人。

在演讲快结束时，李资政也用三首歌回应华社的期待：他请大家放心，不会像黎沸挥一样“等你等到我心痛”。他已经交棒了，不过就如梁文福的歌词，政府会和大家“向着目标，手牵手，一起走到”。接下来的日子，不一定风平浪静，可是陈佳明说得对：我们要有信心“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他幽默风趣的演讲也赢得了现场嘉宾的阵阵掌声。

“华社以他为傲”

晚宴现场还播放了《联合早报》特别制作的视频，回顾李资政担任总理期间对华社和华族文化的关切与贡献。视频中提到，李先生



国务资政李显龙致辞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左）和中华总商会会长高泉庆（右）将本地书画家林子平的书法作品“惠我无疆”赠送给国务资政李显龙（中）



国务资政李显龙（前排左二）在晚宴快结束时同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前排左三）、中华总商会会长高泉庆（前排左一）一起演唱经典新谣歌曲《细水长流》

为新加坡贡献了他最美好的青春，以智慧与担当守护这个岛国，光耀这座城市，“华社以他为傲”。

主办方也向李资政赠送103岁本地书画家林子平的书法作品“惠我无疆”作为纪念。“惠我无疆”出自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周颂·烈文》，全句为“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意思是前辈留下的德泽无限，嘉惠于整个国家，后世的子孙应该努力保有它，使其世代相传，并发扬光大。这句话表达了华社对李资政的感恩之情。

新加坡华乐团和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也在晚宴上呈献了精彩的表演，展现新加坡华族文化的魅力。在晚宴结束前，李资政还上台同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中华总商会会长高泉庆一起演唱了经典新谣歌曲《细水长流》，将晚宴的气氛推向高潮。

题图说明：

出席晚宴的贵宾上台敬酒。左起：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李思亮、国会议长谢健平、宗乡总会副会长曾建权、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部长兼贸工部主管贸易关系部长傅海燕、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席兼新加坡华乐团主席吴绍均、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蔡天宝、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李显龙资政、李资政夫人何晶、中华总商会会长高泉庆、副总理王瑞杰、华社自助理事会信托局主席黄山忠、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通商中国主席李奕贤、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宗乡总会副会长钟声坚，以及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林福星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文图·欧雅丽

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与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出版的《新嘉坡风土记校释》于2024年5月10日（星期五）晚在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观景阁正式发布。国家文物局局长章慧霓、宗乡总会副会长钟声坚、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档案与图书馆部副总裁刘赐慧，与本书的两位校释——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暨东南亚学系系主任廖文辉共同为新书揭幕。当晚有超过100位来自华社团体及文史界的嘉宾们也在现场一起见证了这本新书的面世。

《新嘉坡风土记校释》原书是由清末上海名士李钟珏在1887年来新加坡探访其好友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游历两个月后写成的一本逾7000字的游记，于1895年由湖南长沙使院首次出版。书中记载了李钟珏旅新时对新加坡社会面貌、风土人情的观察，是新加坡早期历史的珍贵文献。原书珍藏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缮本珍藏部，宗乡总会和新纪元大学学院合作将这本珍贵的历史文献进行了细致地校释和注解，增补了有关作者李钟珏的文章，以及《新嘉坡风土记》中提到的名胜场景的今昔对比图片等，多维度再现新加坡早期的历史，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也方便普通读者深入了解新加坡的过去。

宗乡总会副会长钟声坚在致辞中说，《新嘉坡风土记校释》是宗乡总会与新纪元大学学院为学术研究共同努力的成果。自2018年2月双方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学术交流合作备忘录”以来，已共同出版了《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2020年），《新嘉坡风土记校释》是新马两地学术合作的又一成果，为新马历史研究添砖加瓦。今后双方将不断发掘具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丰富和拓展已有的研究，加强更广泛的学术交流，为推进新马历史研究继续努力。

国家文物局局长章慧霓也对宗乡总会在整



百年古籍再现新加坡早期历史 《新嘉坡风土记校释》出版

理新加坡历史档案资料，保存华族传统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她说：“宗乡总会一直以来秉持着服务华人社群的初心，同时也将推广华族文化作为总会一项重要的工作之一。国家文物局一向与宗乡总会紧密地合作，期待宗乡总会今后能更有系统地研究和推出有关新加坡早期历史的文献。宗乡总会应该肩负起保存华族文史资料，传承华人文化的使命，希望在各个单位的努力和积极配合下，我国的文化事业能够蓬勃发展，多姿多彩。”

谈及重刊此书的原因，柯木林表示，李钟珪的《新嘉坡风土记》面世至今已有128年了，1947年许云樵教授再版的注释本，距今也有76年。物换星移，当年书中记载的场景，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加上有新史料的出现，因此就有重新注释、更正和重刊的必要。他也指出了《新嘉坡风土记校释》的几个亮点：一是将古文版本翻译成了白话文和英文，将原文的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并添加了标点符号，还获得国家图书馆特许，将原书函件影印作为附录，呈现原

书原貌；二是收录了有关李钟珪生平事迹的文章，更加立体地展现这本书成书的背景；第三，这本书根据书中描述场景，查找历史图片，到现场拍摄，图文并茂，增加了趣味性。他认为这本书可以方便读者了解新加坡华人社群早期的历史，也可以提高公众对本地历史的认识和兴趣。

本书的另一位校释廖文辉博士则表示，宗乡总会和新纪元大学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后，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接下来，也在探讨继续合作完成其他一些有关新马历史的课题，希望能整合双方的学术研究资源，共同拓展南洋研究。

题图说明：

国家文物局局长章慧霓（右三）、宗乡总会副会长钟声坚（左二）、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档案与图书馆部副总裁刘赐慧（右二），与两位校释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左一）、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暨东南亚学系系主任廖文辉（右一）共同为新书揭幕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你认错人了

文·黄楷婷

我喜欢坐在巷口的那棵榕树下看着她。

巷口正对着一个小公园，供人使用的器材设施大多已经锈蚀，刷上的漆也掉了大半，灰扑扑的，像是蒙了尘。而她喜欢坐在公园的秋千上发呆，穿着干净朴素的棉布裙子，头发是她那个年代流行的样式，梳得一丝不苟，与这片被岁月洗礼过的公园契合得像是一幅画。

日光下披散在地面的树影斑驳，空气恬淡温和，慢悠悠的，像是一曲让人不由自主放松下来的小调。每次经过小公园，我都会轻轻哼起一首她熟悉的小调，然后假装不经意间与她对上视线，扬起一个笑脸向她打招呼：“又见面了。”

而她像受惊的兔子似的抬起头，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警惕：“你认错人了。”

如今，我已经能做到笑容不减，抬起的手在半空中停顿了一刻后，慢慢地收回，擦住衣角，回应的声音欢快：“噢，这样啊。”

烈日炎炎，我坐在榕树下听着蝉声，手上拿着的那杯果汁里晃荡着冰块，散发着令人愉悦的清凉气息。我给自己灌了口果汁，斟酌好词句后，小心翼翼地靠近她，试探着递出手中的另一杯果汁。

她犹疑了片刻，便向我道谢。接过果汁喝了一口后，她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一分惊喜，“我在家里也常喜欢榨这种口味的果汁，我的女儿很喜欢喝。我会在里面放芒果，苹果，还有……”她停顿了很久，眉头皱着，看起来有些烦躁。

“一点酸奶。”我补充着说道，目光顺势

落在她手腕，一副纸质手环正套在她的手上，略微显得有些宽大了，覆在她皱着而粗糙的皮肤上，衬得手腕苍白而纤细。

“是的，一点酸奶。”她小口地喝着杯中的果汁，语速很慢，“我在家里也常喜欢榨这种口味的果汁。”

我笑着看她，一时忘了形：“我知道。”

如同触及藏在某处的警戒线，几乎是在我话音落下的同时，她猛地抬起头，在我们之间筑起一面厚而无形的高墙：“你怎么会知道？你认错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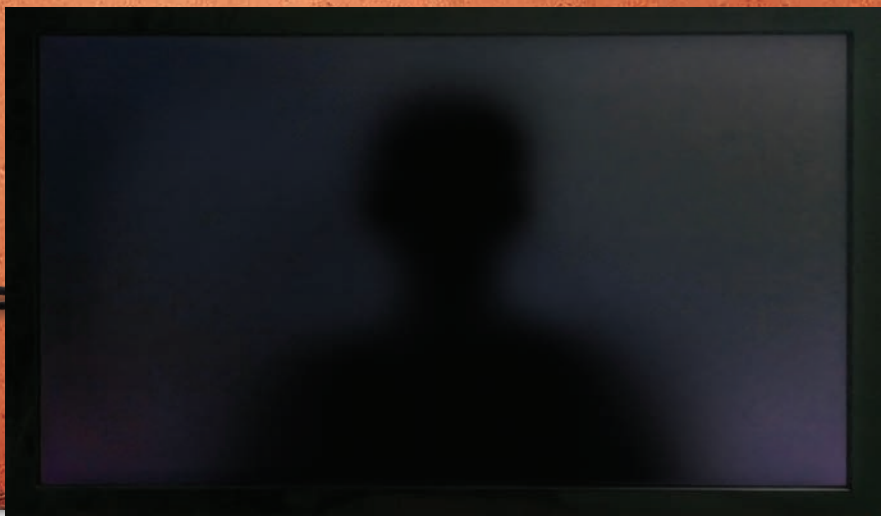
杯子在这一刻摔落在地，未喝完的果汁四处飞溅，染上了她的棉布长裙。我怔愣了片刻，弯腰捡起那沾了尘土的杯子抱在怀中，轻轻应了一声：“我很抱歉。”

我又一次在公园见到坐在秋千上发呆的她。

被遗忘的小公园今天迎来了一群新的客人，穿着明艳衣裳的孩童嬉闹着踏入这片领域，蹦跳在各个设施之间玩得不亦乐乎。最后，他们将目光投在她所坐的秋千上，叽叽喳喳地将她围成一团，提出请她让出位置的请求。

她让开时，只想着玩耍的孩童蜂拥而上。她的动作很慢，又忙着给他们腾出空间，一不留神踩空一步，摔倒在地上。我第一时间走上前将她扶起，她低头拍了拍棉布裙子上的尘土，客气地说了句谢谢。

“这棉布裙子可不好洗，但愿别弄脏了。”我张了张嘴，话音在嗓子里转了个圈，



成了一声笑，“你好像总在这个公园里。”

“我在等我的女儿来接我。”她低垂着眉眼，声音温和，“谢谢你帮我，你是个好心人。你……和我的女儿很像。”

我眨眨眼，目光中带了我自己都未察觉的期待：“你也很像我的母亲。”

她顿了顿，不着痕迹地抬眼打量着我，目光里是我熟悉的警惕：“你……不会想说我是你的家人吧？”

她的棉布裙子沾上了尘土，梳得一丝不苟的白发也散乱了，我仍搀着她的手，苍白血质手环上的打印字体映入我的眼中。

“家中长辈，身患阿尔兹海默症，如有走失，请联系电话……”

后面那串数字，是我无比熟悉的电话号码。

我摇摇头，深吸一口气，扯出一个笑：“没有，我认错人了。”

林高评语：

母亲已失忆。女儿要陪伴和照顾母亲，因此领会到母亲的改变不是常理可以理解的。失忆的人有感觉吗？她们在想些什么？看顾的人要具备相关的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加倍的爱心和耐心。小说的结尾引人感伤，旨意却不止于感伤。失忆者的存在意味着生命的报废吗？应该怎么去对待？这是读后要想的。

屏

文·于锐霖

我眼前有块屏
屏上只有个黑黑的我

屏亮了
像打着了的火炉
现实在里面被捣碎，熔炼
炼出肥美的油，再与声色一起
搅成漩涡
我一头扎进去
让缤纷的世界灌进耳目

我眼前没有我

林高评语：

“屏”可作多方面的想象：电脑/电视荧光屏、手机之视频，还有广告之类……在这个缤纷的现实里，我被捣碎，现实如火，把我熔炼。活着就必须保持自觉、清醒，不是容易做到的。这首诗，短而意涵丰富。



爱上七里香

作者·齐亚蓉

1

初涉职场时，曾被一位半生不熟的同僚身上浓郁的香气熏得差点儿吐出来，从此对于任何散发香味的东西，诸如香精、香水之类敬而远之，即便是清清淡淡的花香，也能躲则躲能避则避。似乎沾染了香气即等同于俗气，而想要超凡脱俗，就非得同世间所有跟香沾亲带故之物来个一刀两断不可。

这一方面固然跟敏感的嗅觉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自己成长环境的简单粗朴——跟香脂、香粉、香茶之类完全不搭边。至于花香，虽然小时候老家院子四周也是春来桃李争艳、杏粉梨白，但那俏立枝头的花儿似乎从来吝于

飘香，或者说它们的香气淡到可以忽略不计，又或者那淡淡的花香刚刚散发出来就被风吹走了，而整日忙于填饱肚子的老少，谁也没有闲情逸致专意去树下把那花枝拉过来嗅吸一番，而只是在舒展腰身的当儿远远地朝树上望几眼，以至于记忆中只有花开灿烂，没有花香扑鼻。

而田垄、河畔那繁星似的野花，也从来没人想着要把它们采下来带回家，更没人俯下身去探究那些花的气味，即便那金灿灿的油菜花，人们关注的也只是那花丛里翩翩起舞的蝴蝶以及当年油菜籽的产量。

后来去省城读大学，见到了校园里的玉兰

花、牡丹花，见到了植物园里的郁金香、秋海棠，无论别人怎样欢欣雀跃，我总觉得它们无论如何也比不得家乡的野花灵气，也就只是远观，不曾近瞧，那花香跟我之间始终隔着一段长长的距离。

2

初抵这个“花园城市”的那些年头，整日里忙于为生计东奔西走，随处可见的热带花卉于我而言就跟那天上的太阳般刺眼，叫人完全没有想要多看一眼的冲动。一颗焦躁不安的心终日浮在半空，即使睡梦中，也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

初次听闻七里香在周杰伦的歌里，该有好些年头了。那个爱唱歌的女孩子是我的学生，整天戴着耳机摇头晃脑，有一次，她硬是把耳机塞进我的耳朵里，说周杰伦的这首《七里香》我一定喜欢，但我听了半天也不清楚歌里到底都唱了些什么，只是觉得一个大男人的歌叫了这么个名，一定俗不可耐。后来无意间看到了歌词，倒是记住了半句——“初恋的香味”。

好些年之后才知道，这七里香的香气里确实透着丝丝甜蜜，于是上网找到歌词，对照着把那歌听了好几遍。

“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那温暖的阳光，像刚摘的鲜艳草莓……”

第一次感觉到，《七里香》的名字真的很美。

3

大概八九年前，在历经了一场生死磨难之后，我终于放慢了脚步，开始尝试享受小隐于林的淡泊宁静，每日晨曦初露之时，便跟一群结识不久的拳友到楼下河畔树荫下的步道上打拳舞剑。悠扬的乐曲伴着流水潺潺，伴着鸟鸣啾啾，整颗心跟那河里的流水般柔软而淡定，而时不时飘来的花香则瞬间叫人好生感动。每每此时，拳友们都情不自禁地鼻翼翕动，意欲寻得那醉人的香气来自何处。此时的我早已被那花香俘获，不知是心念所动还是真的花香附

身，不但蜜蜂落在我的肩头、手背，就连那不多见的蝴蝶也频频绕着我的头顶飞来飞去，怎么赶也赶不走。

“花仙子啊，你一定是花仙子。”拳友们常常如是说。

紧挨我们身后的是几棵高大的花树，红红白白的花穗开了落了，落了又开。花香袭来之时，大家总会不约而同地转身抬头仰望，想着那香气一定来自这些距离自己最近的花树，不然何以如此真切？如此浓郁？

而此时的我也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年轻时对花香的反感纯属误会。我的那位同僚身上的浓香当属脂粉香，跟自然的花草香根本两回事。

于是开始留意起身边的花木来，逢年过节之际，也会去花卉市场买些鲜花回来插在瓶里。这才发现，每一种花都有其独特的香味：有的浓郁，有的清淡，有的香中带甜，有的甜里透香，但无论哪种花香，都那么令人心神愉悦——养花植草的冲动悄然萌生。

大概六七年前，住家附近的小花店开张，于是常常去那里闲逛，今天买回一盆水梅，明天购得一盆月季，家里很快花木葱茏，生机盎然。

一日，瞥见花丛中一盆开着小白花的矮小植物，瞬间感动莫名。一问之下方知竟然就是自己神往已久的七里香，连忙凑近嗅吸了一下，一股清香浸入心脾，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毫不犹豫买下来抱回家，后来又陆续购得四盆，从此五盆七里香陪伴左右，每过一段日子即可回味一下“初恋的味道”了。

4

五年前的某个清晨，练功即将结束之际，一阵浓郁的花香袭来。猛抬头，发现头顶的花树上除了绿叶还是绿叶，全然没有开花的迹象，不由得心生疑问，目光随即移向远处，这才发现十余米开外一排相对低矮的树丛上开满了白灿灿的花儿，满怀激动直奔过去。没错，七里香！跟家里养的一模一样。只不过家里的往往花开三五朵，须凑近方可闻其香，哪像眼前树上树下满眼洁白的花瓣儿，即使飘香千里

应该也不是问题。

欢心雀跃的同时不禁生出一丝感慨来：足足嗅吸了七八年的花香才觅得其真正的出处，虽然后知后觉，但终究美事一桩。那几棵高大的花树白白享了这么多年的美名，这会儿该捂嘴偷笑了吧，而这相对低矮的七里香，默默飘香七八载终于引来一双含笑的泪眼，它们是否该惊呼“花香不怕身子矮”了呢？

而家里的区区五盆比起公园里的这一整排，可谓一棵林木跟整片森林了，以后的日子可就真正处处绿树白花七里香了啊。

5

爱上七里香，每天离开河畔回家之时，定会往身后深情一瞥。虽然大多时候只是碧绿的树叶，但知道那白嫩的花瓣儿过段时日定会欣然绽开。

雨水充足，阳光充沛，花开时节说来就来。高高低低一整排，步调一致，泼泼洒洒，从含苞到飘落前后不过四五天。每每看到树下满地雪白，常常心疼得林妹妹般，恨不得缝个花囊把那花瓣儿全都收起来。

而家里的五盆则各自为政，这盆花已落，那盆始含苞，另外三盆则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但突然有那么一日，其中一盆会悄悄地绽出三五朵小白花儿来。

无论绽开时还是飘落后，那花瓣儿永远安静如初：既不因闪亮登场而张扬，也不因仓促谢幕而颓丧。

不忘初心，淡泊宁静，不正是多少人终其一生想要追求的境界么？

从河畔到家里，从家里到河畔，一颗寻觅的心不再飘飘荡荡。

爱上七里香，其实跟她的香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人生之旅中的一次机缘巧合：人之灵之魂跟花之灵之魂撞个正着，于是执手相依，不离不弃。

6

不曾料想，静好的岁月被肆虐的疫情打乱。自大前年四月的某一天，拳友们不再聚集

河畔，前后两个月到处一片冷清清，居家“为国做贡献”的日子里，一颗被“囚禁”的心没有丝毫慌乱。只是伫立窗前眺望河畔之时，不期然会念起多日不见的七里香：那悄然绽开的花瓣会因目睹人间的不幸乱了阵脚吗？那随风飘散的花香会因耳闻世间的纷乱失了魂魄吗？

答案是否定的。

但我还是在某个阴晴不定的清晨，戴着口罩来到四处绑着彩色布条（用以阻止人们聚集）的河畔。站在空荡荡的步道，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感涌上心头，然放眼十多米外的七里香，但见苍翠欲滴的叶片间，隐约可见的花蕾星星点点。会心一笑的当儿，我的眼前瞬间一片朦胧。

几个月之后，拳友们终于回到了河畔，为了保持安全距离，我们只好放弃树荫下的步道，改而在两三百米外的草地上大展拳脚。

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大概都跟七里香有关。

“等一下过去看看，应该快要开花了吧。”

“花蕾已经长出来，没准明天就开了呢。”

看来爱上七里香的，不仅仅只是我一人。

转眼两三年成为了过去，习惯了草地上的空旷与开阔，拳友们在疫情结束之后也没再回到步道上的树荫下，那些七里香似乎也渐渐被大家淡忘了。但我每隔几天总会过去探望一下，因为于我而言，那排让我在不知不觉间不再对香味存有偏见，并深深爱上所有花草香的七里香，它们仿若我的人生导师，让我能以更加开阔的心胸拥抱这个世界：爱上七里香，无异于爱上脚下的这块土地——这块曾让我在去留之间纠结十多载的土地，这个堪称第二故乡的热带岛国。

前几日晨运回到组屋楼下，一股熟悉的清香扑鼻而来。是它，七里香——就在离我数米远的地方，就在不久之前翻修完毕的游乐场旁，一排低矮的花树迎风而立，吐露芬芳。

微微一笑，走进电梯，沾满花香的泪珠溢出眼眶……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源》杂志

优秀文学作品奖 2024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散文。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散文（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4000 字左右。

投稿：即日起至2024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

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历史、时事、本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
- 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并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杂志。

稿件录用

经刊登，稿费从优。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公开，公平、公正的《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



蔡荣恩作品《亮黄色》布面胶彩 120x150cm (2023)